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系

碩士論文

Graduate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理性、儒家價值與個人福利需求：中國大陸案例的分析  
Rational Choice, Confucian Values and Welfare Demand:  
The Case of China

黃忠偉

Chung-Wei Huang

指導教授：張佑宗博士

Advisor: Yu-Tzung Chang, Ph.D.

中華民國 104 年 4 月

April, 2015

國立臺灣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理性、儒家價值與個人福利需求：  
中國大陸案例的分析

**Rational Choice, Confucian Values and Welfare Demand:  
The case of China**

本論文係黃忠偉君（學號：R00322061）在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完成之碩士學位論文，於民國 104 年 4 月 23 日承下列考試委員審查通過及口試及格，特此證明

口試委員：

張佑宗

（簽名）

（指導教授）

吳親恩

徐斯勤



# 謝辭



是新的一年了。唯有在新的一天已來，夜還深不見底之時，才有深深呼吸，輕輕把心放下，開始書寫的可能性。


當然我是不能再寫詩了。詩是從屬於青春，從屬於晦澀的暗戀的時代，而我們早已褪去偽裝，開誠布公了我們的戀愛。十年以來我所不斷在現實與夢境中追索而去的你們，此刻都在我身旁了。我是不能再寫詩，但還有一本論文，見證了我們因太過接近而別離，又因太過思念而重聚的過程。這就是我們的故事，離別與妒嫉總是酸澀，但歸零的距離卻又是甜美地令人不禁垂涎。

2012年說好的末日未曾到來，於是，終於，我與你有了交集，而政治學也終於與我有了正式的關係。這本論文能夠見諸於世，一如我們親愛的勺，沒有你在這裡，一切全無可能。沒有什麼不因為你，從臺北到花蓮，從高雄到屏東，一切均因你而生而繁華，dear you.

這本論文的出現還要歸功兩位我將銘記一生的老師，沒有你們的推力與拉力，我將失去對夢的想像，與圓夢的可能。首先是成大的高雅慧老師，是你的飲茶對談讓我立定決心，重新找回懷抱夢想無畏前行的自己，那是我此生至今最挫敗的轉折，但沒有這酸楚，也就沒有回甘的可能。能在臺南的陽光，與老師的教導下度過兩年的時光，藥學生所謂的幸福，當如是也。

然後是指導我的張佑宗老師。老師呀，我們都是羞澀的人，容我找不到一個更好的詞，來描述我對您的感激。大學時代，老師的課也許沒有最好的風評，但卻讓我覺得無比的充實與滿足，在求知若渴的時代，是老師給了我養分，令我得以蛻伏到回來的那一天。回到臺北，是老師給了我機會，給了我啟發，包容了學生多不勝數的任性與叛逆，撫平了焦慮與懷疑，在腳步踟躕的時候，催促著我們前行。是你讓我知道這裡玫瑰不在他處，這裡就是值得我們起舞的所在，這裡不是他方，這裡就是東亞民主研究室。

因此，容我留一個段落感謝東亞的大家：從信宏學長的咖啡、贊文的垃圾話、守芬的啤酒、振嘉學長屢次震聾發聵的意見、Mark的英式英文、彥廷的政治分析、恭安學長，維琪學姊與珮如學姊的接納與包容、嘉璘學姊的無私協助、雅惠學姊在中研院的午後談話，到賴家賢總是事事可做、有話可說的一切的一切，有機會的話，我們再來養條魚吧。另外，感謝文欽學長的指導與欣欣學姊的開導，是你們讓這個研究室蓬華生輝，也讓我這個不得不困守島國的抑鬱學子，嗅得一絲海外進步的氣息。還有頌恩學長，那個下午你的長談讓我確立了對福利國家的研究目標，願你仍過的安好，還在實現目標的道路上前行不輟。還有陳力和建實，營隊裡我們討論了好多好多，願未來的學術路上，我們還有機會像那個夏天一樣促膝長談。



當然還要感謝吳親恩老師與呂建德老師，是你們給了我這麼多意見，讓我得以完善這本論文。呂老師，我是多麼想再和你探論福利需求的諸多問題，在你完成在台中的工作之前，我會好好等待。也感謝陶儀芬老師在中國大陸政治與經濟問題上的啟發，以及徐斯勤老師在口試時的意見。對我而言，是你們讓我有機會用不同的視角觀看中國，希望有一日，我的拙作也能讓老師們見到不同的中國。

還有呂庭維老師，是你帶領的環島讓我對這座島嶼重新傾心，也是你追逐夢想的決心，引領了我前行的勇氣。感謝高雄的陽光、臺北的雨，是這個國家的美麗與哀愁讓我不能不涉足政治、探論政治，願有那麼一日，讓我為你的美好與進步，再添新妝。美惠姊啊，我會記得你對我的照顧，因為記得這一切，即便臺北陰雨綿綿，我仍有南方的光線給我以庇蔭，予我以希望。還有C與M，是你推了我一把，讓我來到這裡，佇立於此，不再害怕。還有丹，和你的聊天總是那麼熱熱鬧鬧，因為你對孔子的敬拜，我的論文也如此儒家了。

是尾聲了。叨叨絮絮的以上這些，容你原諒，也容我再敘一次，沒有你在這裡，一切全無可能。所有一切均因為你，我摯愛的妻，  
dear you.

於臺北，木柵，萬安街。

April, 2015

# 中文摘要



改革開放 30 年以來，中國已經由一均貧的社會轉向小康，但「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結果，卻使貧富不均與社會福利不足成為中國最主要的社會問題。除了由上而下「構建和諧社會」外，由下而上的福利需求也受到眾多注目。而過去，針對福利需求的社會政策偏好研究以理性選擇理論為基礎，建構個人福利需求的一般化模型，並提出以收入、職業風險等經濟稟賦為主要影響因素的理論。然而同時，過去學界多以「儒家福利體系」統括中國所在的東亞地區，認為東亞社會的儒家文化使執政者得以將福利供給的角色由政府轉向家庭，而減少其福利開支，亦即文化價值是決定該地區福利體系的重要因素，同時也包含了中國。

然而上述兩個分別由總體與個體層次出發的理論，卻同時有其不足之處。若文化價值的確是影響福利體系的重要因素，那麼在個人層次，文化價值是否也將影響民眾的福利需求？另外，根據我們對儒家典籍的解讀，儒家價值的內涵似乎也並不與福利國家相互抵觸。因此，本文便是要補足上述的不足，在個人層次上檢驗文化價值對福利需求的影響，並假設儒家價值將加強，而非減低個人的福利需求。

由本文的分析結果發現，儒家價值的確對中國民眾的福利需求產生正向的影響。而當將儒家價值區分為「家父長主義價值」、「社群主義價值」與「家庭主義價值」三構面時，則發現家父長主義與家庭主義為儒家文化中影響福利需求的主要因素。同時，經濟變數亦影響中國民眾的福利需求，符合既有研究基於理性選擇的假設。最後，社會經濟變數對福利需求的影響力展現了與西方相異的「中國特色」，其結果與中國 30 年改革開放的經驗與影響息息相關。

本文確立了文化價值與福利需求之間的關聯，然而，從福利需求到福利供給，仍有許多影響的因素。另外，中國高速的社會轉型所帶來的文化變遷，也將使文化價值對福利需求的影響力產生改變，其改變的結果，與由需求到供給之間的連結，將是我們必須接續關心的目標。

關鍵詞：中國研究、儒家價值、福利國家、社會公平、重分配、理性選擇



# Abstract



It has been thirty years since China start its economic reform and rapid development. However, with "some people become wealthy first", the issue of inequality and lack of welfare infrastructure turned into most social problem in modern China. Besides the "building harmonious society" propaganda, welfare demands from bottom also drew larger attention. Based on rational choice theory, scholars emphasize that personal economic endowment and related utility from welfare state determine demand to welfare state. Meanwhile, many scholars described welfare system in East Asia as "Confucius welfare state", and Confucian values had been deployed as reason for government ruler to keep low welfare supply. It means, culture values are determinant of welfare system in East Asia, including China.

However, both theory has their theoretical vacancy. If culture really matters, then will they affect welfare demands in individual level? Also, from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 to Confucian context, we found that Confucian values might possibly enhance welfare demand in individual level. This article provides different points of view that in China, Confucian values affect welfare demand individually and in positive way.

The hypotheses above had been confirmed from our statistical analysis. First, Confucian values did affect welfare demand within Chinese people in positive way. Second, "paternalism" and "familism" aspects in confucian values are the main determinant to personal welfare demand. However, "communitarianism" aspect did not acheive statistical significant in our study. In the mean time, the significancy of economic variables confirmed that social policy preference theory is suitable for Chinese people. Influences of other variables showed th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cause of the outcome is closely related to economic reform in the past thirty years.

We confirme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culture values and welfare de-

mand in Chinese people. Nevertheless, there are many other factors in the causal chain from welfare demand to supply. The culture shift from fast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society may also affects Confucian value's influence to welfare demand. The consequences of culture shift and the connection between demand and supply, are the most important features which deserve our focu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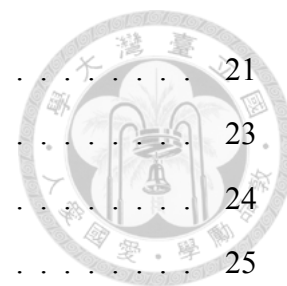
Key words: China study, Confucian values, Welfare state, Social justice, Redistribution, Rational choice

# 目錄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i
謝辭	iii
中文摘要	v
Abstract	vii
目錄	ix
圖目錄	xiii
表目錄	xv
<b>1 緒論</b>	<b>1</b>
1.1 研究背景	1
1.1.1 東亞與中國：福利革命與所得不均	1
1.1.2 中國：經濟發展與不平等	2
1.1.3 福利需求與文化價值：失落的拼圖	4
1.2 福利體系分類成因與轉型	5
1.3 從東亞看中國：福利體系簡述	7
1.3.1 中國福利體系簡述	7
1.3.2 東亞福利體系探源	9
1.3.3 東亞福利轉型：變革與挑戰	12
1.4 研究資料與方法	13
1.5 章節安排	13
<b>2 理論與研究假設</b>	<b>17</b>
2.1 福利偏好的一般化模型與影響因素	17
2.2 非經濟因素與福利需求	19
2.3 儒家價值中的福利國家	21

2.3.1	家父長制功績主義 (Paternalistic meritocracy)	21
2.3.2	社群主義 (Communitarianism)	23
2.3.3	家庭主義 (Familism)	24
2.4	研究假設	25
<b>3</b>	<b>研究設計</b>	<b>27</b>
3.1	研究資料與分析單位	27
3.2	變項說明	27
3.3	研究模型與統計方法	30
<b>4</b>	<b>實證分析</b>	<b>31</b>
4.1	敘述統計	31
4.2	儒家價值的因素分析	33
4.3	單變數關係	34
4.4	福利需求的邏輯斯迴歸分析	35
4.5	福利需求的多層次邏輯斯迴歸分析	41
<b>5</b>	<b>結果與討論</b>	<b>49</b>
5.1	經濟與非經濟因素	49
5.2	儒家價值的影響	55
5.3	小結	58
<b>6</b>	<b>結論：文化遺緒與福利國家</b>	<b>59</b>
6.1	自個人到國家：福利轉型的關鍵	59
6.2	儒家價值與現代價值	61
6.3	研究限制與未來展望	63
<b>A</b>	<b>附錄</b>	<b>65</b>
A.1	序位邏輯斯迴歸分析 (ordered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65
A.1.1	分析結果	65
A.1.2	討論	69
A.2	變項說明	70



A.3 迴歸模型的變項訊息 ..... 72

參考文獻 ..... 73





# 圖目錄



1.1 福利支出佔 GDP 比率成長率（資料來源：OECD、中華民國行政院主計處）	2
1.2 中國吉尼係數：1981-2001（轉載自 World Bank, Inequality in focus 2(2), 2013）	3
1.3 中國社會支出佔 GDP 百分比：1978-2009（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鑑）	9
4.1 樣本年齡分佈	31
4.2 因素分析的 Scree test	33
4.3 自變數與控制變數勝算比 - 模型 5	42
4.4 自變數與控制變數勝算比 - 模型 6	42
4.5 自變數與控制變數勝算比 - 模型 7	43
4.6 自變數與控制變數勝算比 - 模型 8	43
4.7 自變數與控制變數勝算比 - 多層次模型 1	47
4.8 自變數與控制變數勝算比 - 多層次模型 2	47
5.1 中國城鄉居民收入比：1985-2012（轉載自 Inequality in focus 2（2）, 2013）	51
5.2 城鄉居民收入成長率的消長：1979-2008（轉載自 Huang, 2010）	52
5.3 中國人均薪資：2005-2015（資料來源：中國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製圖： <a href="http://www.tradingeconomics.com/">http://www.tradingeconomics.com/</a> ）	54
6.1 各國價值觀變遷：1981-2007（轉載自 Ronald Inglehart 於 2012 年台北演講時所提供之未發表資料）	62
A.1 序位邏輯斯迴歸各自變數勝算比	69



# 表目錄



4.1 敘述統計：年齡	32
4.2 敘述統計：依變數、性別、城鄉分佈	32
4.3 敘述統計：教育程度	32
4.4 敘述統計：儒家價值	32
4.5 因素分析：儒家價值	34
4.6 卡方統計結果	36
4.7 個體預測機率	39
4.8 邏輯斯回歸模型 1-4	40
4.9 邏輯斯回歸模型 5-7	41
4.10 邏輯斯回歸模型 8	44
4.11 多層次邏輯斯回歸模型	46
A.1 敘述統計：依變數序位分佈	65
A.2 序位邏輯斯回歸模型 1-3	67
A.3 序位邏輯斯回歸模型 4-6	68
A.4 題目內容與變項建構 - 依變項	70
A.5 題目內容與變項建構 - 經濟自利變項	70
A.6 題目內容與變項建構 - 經濟自利變項	70
A.7 題目內容與變項建構 - 儒家價值變項	71
A.8 題目內容與變項建構 - 基本變項	71
A.9 迴歸模型的變項訊息	72



# 第一章 緒論



## 1.1 研究背景

### 1.1.1 東亞與中國：福利革命與所得不均

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東亞地區不僅因經濟上的高度成長而備受重視，其福利體系的改革與擴張由於影響者眾，將對全球經濟與民眾生活產生極大影響，因而受到高度關注。根據 2012 年九月《經濟學人》的報導，印尼在 2014 年提供的全民醫療保險，將使印尼政府成為世界最大的單一支付者；中國對農村民眾提供的年金體系所涵蓋的民眾數，已超越美國社會保險的總人數；另一大國印度也將把一億貧困人口納入其健保計畫，其人數甚至是美國沒有醫療保險人口的兩倍 (Economist, 2012)。這三個亞洲大國擁有 28 億人口數，佔全球人口的四成之多，意味著在這些國家中進行的福利轉型，將大大改變世界多數人類的生活。除人口大國外，東亞經濟發展的先行者如台灣、日本與韓國，其福利革命早已在二十世紀末葉便啟動，開始出現普遍且全括式的 (inclusive) 社會福利體系，包含了全國性的醫療保險、失業救濟補助與國民年金體系等，其福利支出成長率也遠高於同時期的西方國家 (見圖 1.1)。同一時期，香港與新加坡行之有年的公積金制度也出現了體制改革與涵蓋層面的擴張。「福利國家」這個詞彙終於由二次大戰後的歐洲，歷經半世紀，跨越半個地球，來到人口稠密的東亞季風地帶。

福利政策的擴張並非一日可及。在二十世紀末起才開始啟動的高速轉型前，東亞國家的政治經濟體系多著重於促進經濟發展及維持政治穩定。相較於西方諸國，東亞國家社會福利體系的特色除支出較低外，社會福利作為公民權的概念也較不普及，其主要福利提供者多為家庭與社會組織，而非國家。另外，社會保險機制也多針對國營企業與大企業雇員，而不存在普及全民的福利體系 (Goodman et al., 1998; Chau and Yu, 2005)。因此，近數十年來福利轉型的現象與成因便受到高度的關注。此外，2008 年金融海嘯後，對經濟不平等現象的抗爭甚或革命席捲了全球，99% 面對 1% 的鬥爭彷彿一觸即發。東亞地區雖未出現劍拔弩張的動盪局勢，但社會公平與重分配議題也成為台灣與韓國的選舉焦點<sup>1</sup>。在經濟發展過程

<sup>1</sup>如韓國的「經濟民主化」，台灣的「世代正義」等議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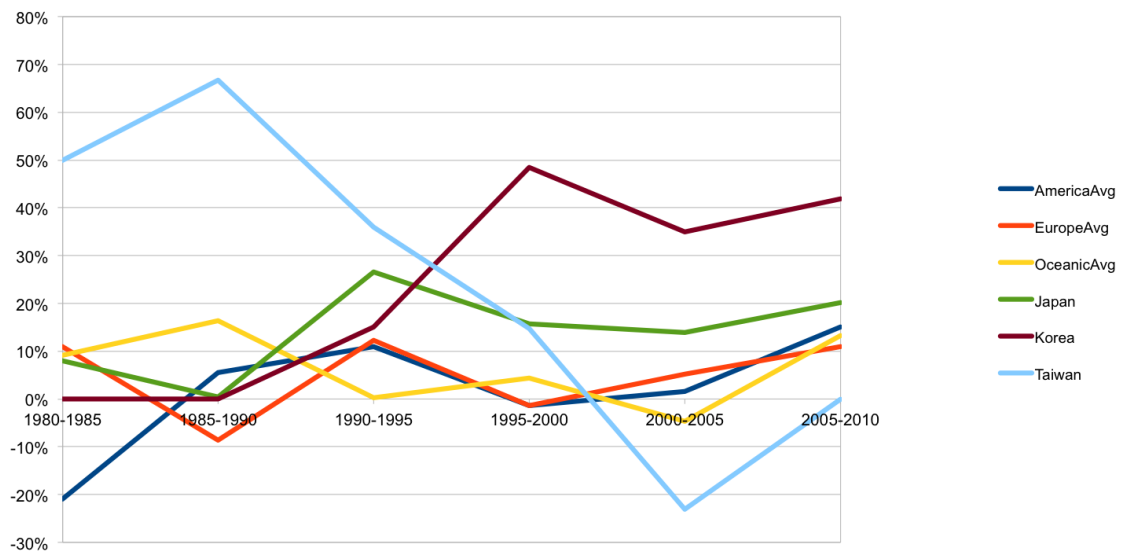


圖 1.1: 福利支出佔 GDP 比率成長率 (資料來源: OECD、中華民國行政院主計處)

中，所得分配相對平等的台、韓尚且如此，更不用說自改革開放以來，所得差距日益增大的中國了。

### 1.1.2 中國：經濟發展與不平等

在經濟高度發展但所得分配極為不均的中國，出現對於社會公平與國家福利體制改革的討論，其實並不令人意外。在高度市場化的經濟體系下，面對高聳的三座大山（醫療、住房、教育），基層民眾如何看待國家在社會福利中扮演的角色，也就變得十分重要。

自新中國成立至 1980 年代的改革開放為止，中國的所得不平等一直處在很低的程度 (UNU-WIDER, 2014)，吉尼係數約多在 0.3 左右徘徊。然而在經濟自由化前這種眾人皆貧的狀態，在改革開放後出現了十分顯著的改變（見圖 1.2）。以世界銀行所提供的資料看來，中國的吉尼係數由 0.3 逐步上升至 2011 年的 0.5 之譜，而許多獨立調查也顯示，中國的收入不平等自 1990 年起呈現高速上升的趨勢 (Xie and Zhou, 2014)，在美國中情局 2014 年的不平等指數排行上，中國也在 141 個國家中名列第 27 名。藉由民意調查的結果，也發現在中國民眾的觀點中，貧富差距是民眾認為最重要的社會問題 (Whyte, 2010)。

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中國政府雖使數億民眾在短短數十年內脫貧，但富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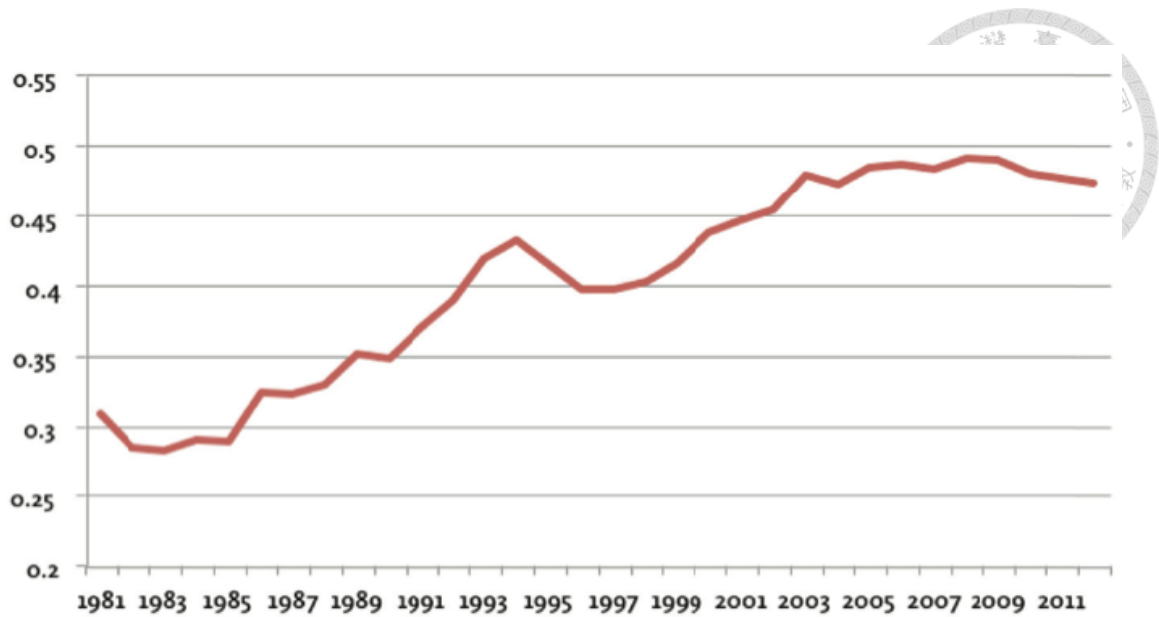


圖 1.2: 中國吉尼係數：1981-2011 (轉載自 World Bank, *Inequality in focus* 2(2), 2013)

者財富的快速累積，市場私有化帶來的資本利得（特別是房地產）與城鄉及區域（內陸與沿海）之間的發展差異，使中國民眾的所得與財產分配上高度不均 (Sicular et al., 2013)。即使多數中國民眾能夠忍受高度的不平等 (Whyte, 2010)<sup>2</sup>，在全國性的民意調查中也發現，多數民眾認為經濟的不平等是最嚴重的社會問題，較腐敗或失業問題都來得重要 (Xie et al., 2013)。

而高度的社會不平等中，最受注目的便是日益浮現的社會福利需求。改革開放後的新中國，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等三座大山早已不復存在，然而，醫療與教育的產業化及房地產市場的私有化，則使許多民眾在醫療、住房、教育等民生基本需求上遇到困境。而政府在這三者上的不作為，也使三者成為多數中國地方騷動的導火線。在缺乏民主課責與適當釋放民眾需求壓力渠道的中國，對於社會福利的需求多只能見諸於報章的討論，而難以轉化為實際的政策產出，我們也無法從中國民眾的投票結果觀察民眾對左右兩派的好惡。此外，既有調查結果與文獻的稀缺，也使中國民眾對社會福利的需求為何，哪些因素將影響民眾的福利需求等問題，仍難以有較具體的回答。

<sup>2</sup>而此不平等能為民眾接受的原因，我們將在後文中與本研究結果進行討論



### 1.1.3 福利需求與文化價值：失落的拼圖

基層民眾如何看待國家在經濟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是社會福利需求如何轉化為社會福利政策產出的重要問題。在二十一世紀第一個十年以來，隨著理性選擇理論與民主化洪流席捲政治學界，個體社會政策偏好（social policy preference）研究，佔據了政治經濟學界的主流場域，使社會福利研究由過去的巨觀層次分析下達到個體層次。隨著民主成為多數已開發國家政治世界的唯一遊戲規則（the only game in the town），民意的需求將影響政治菁英的決策，也將改變社會政策的產出，即使在非民主的中國，我們也能看見政治菁英在面對地方騷動等政治壓力時，會採取許多恩威並施的政策來加以應對。而隨著統計技術與大樣本民意調查的進步，我們得以在不同樣本中驗證過去基於個體需求層次的假說，如社會聯盟、全球化或去工業化等因素是否影響民眾對社會福利的看法。其次，以理性自利個人為基礎，由個體效用出發所建立的社會政策偏好一般化模型（formal model），也得以民意調查資料與統計技術來加以驗證。

隨著政治菁英們必須更多地回應民眾的需求，使我們在討論東亞福利體系變革的同時，更應關注民眾對於國家在重分配與社會福利的看法為何，以及影響這些看法的因素。根據經濟學者所建立的一般化模型，福利政策對個人的經濟功效是決定其福利需求的重要因素，而以個人經濟情況與職業風險對此影響最甚。此外，階級、個人的宗教傾向、政治意識型態等因素也將影響民眾對福利國家的需求。然而，對以上模型的實際驗證多基於以西方民眾為主的調查資料，而缺乏對東亞民眾的分析。相較於個人主義程度較高，宗教影響政治的脈絡較深的西方，東亞國家的群眾似乎更為社群主義，更重視家庭，政治的宗教色彩也較為淡薄，新中國成立後甚至以無神論為主流，即便改革開放後，也不見宗教在政治上的影響力<sup>3</sup>。因此在此不同的政治文化下，上述「一般化理論」是否能適用於東亞國家甚至中國，將值得我們進一步探究。

無獨有偶地，過去，學者多以儒家價值來概括東亞福利體系，認為延續迄今的文化遺蹟是塑造東亞地區福利制度的主因，而這也是前述「一般化理論」所未能觸及的因素。東亞國家的統治者由儒家政治文化出發，利用其自助的精神與對家庭的重視，為其低政府支出、高度依賴家庭與地方社群的福利體系提供正當性，

<sup>3</sup>至少在官方的政策下，宗教沒有進入政治領域的空間

也使政府得以將經濟發展視為第一考量，而延緩甚至抑制了社會福利的擴張。然而，該觀點雖建立在儒家價值與福利擴張相悖的基礎上，但在個體層次上，迄今仍未有檢證該因果鏈的實證研究。

因此，本研究之主要目標即是要探究影響中國民眾對福利國家需求的因素為何，而過去文獻中被一再提及的儒家價值又將如何形塑個體的福利偏好。本文目的在於補足既有研究之不足，首先將針對個體層次的福利偏好研究延伸至東亞，並以中國為例，檢證以經濟條件與職業風險為主的一般化理論在中國民眾中的適用性。此外，更針對儒家政治文化與福利需求的關係提出新假設，認為在該地區，儒家價值將為影響人們的福利偏好的主要文化因素，且其影響方向並非過去學者所提出的負向關係。反之，由儒家價值中的家父長制功績主義、社群主義與家庭主義三個構面與其內涵，本文預期在個體層次上，傳統的儒家價值反而將使人們更企求現代國家的福利供給。

## 1.2 福利體系分類成因與轉型

過去對福利體系的討論集中於福利資本主義的分類，與資本主義發展與福利體系的關係。對二十世紀以來的福利擴張的現象與差異，學界中以左派影響力、經濟發展脈絡、全球化、去工業化、以及政治文化等解釋最為豐碩。

Esping-Andersen 於 1990 年以去商品化 (decommodification)、社會階層化效果 (social stratification) 與市場-政府間關係 (private-public mix) 三者，將 18 個 OECD 資本主義國家分為自由 (liberal)、保守 (conserveative) 與社會民主 (social democratic) 三類福利體制 (welfare regimes)，並分別以美國、德國與瑞典為其代表型國家 (Esping-Andersen, 1990)。在自由的體制中，國家僅提供最少的福利，且基於個人財力審查 (means-test) 對其接受者資格做出嚴格限制，並造成烙印效果 (stigmatised)。保守的體制則有「地位分化」(status differentiating) 的特色，其福利與所得相關，且多由雇主提供，而有維持現有社會模式的效果，此外，也十分強調家庭對福利提供的重要性。而社會民主體制則提供適用範圍最廣泛，實際轉移支出也最高的福利，其特色便是對充分就業與收入保障的承諾，而強大的介入式政府則藉由重分配的社會安全體系促進社會平等。形成三種不同體系的原因來自不同的階級動員 (class mobilization)、階級-政治聯合結

構 (class-political coalition structures)、政體組織化的歷史遺績 (historical legacy of regime institutionalization) 三者。階級動員所關注的是工會的力量，而農民則在階級聯合中扮演重要角色，不過，在整個福利體系的鞏固過程中，中產階級的態度才是其中的關鍵。本書甫出版便成為學術圈爭辯焦點，並對其理論、研究方法及其適用性進行討論，並對其研究樣本進行擴張，也更著重性別、政治與公共服務的角色 (Bambra, 2007)。

然而，由於 Esping-Andersen 僅將 OECD 國家納入分析，因此有學者也將歐盟其他國家與東亞國家納入研究，而區分出其他的分類。另外，在三種福利世界的探討中，對去商品化的概念未涉及性別、也忽視女性與家庭提供福利的角色，更未討論型塑社會階層之一的性別因素，因而有學者提出必須將去家庭化 (defamilisation) 的程度納入分析脈絡。此外，Esping-Andersen 對福利體系的產出也並未考量如教育或醫療等社會福利的角色。在研究方法上，亦有學者採取統計上更妥善的方法，如集群分析 (cluster analysis)，以進行更精細的區分。然而無論該分類學妥善與否，這三種對於福利體系的分類方法與結果，都使福利體系的研究開始受到社會科學界的關注。

而由企業應對協和問題 (coordination problem) 的方針出發，資本主義類型論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VofC) 將已開發資本主義國家區分為兩類：歐洲國家的協合式市場經濟體 (Coordinated Market Economies, CMEs) 與出現於英美的自由式市場經濟體 (Liberal Market Economies, LMEs)，並分析其中特定制度安排的差異，認為政治經濟的安排會影響企業，而採取較為自由或與雇員統合的策略 (Hall and Soskice, 2001)。在其理論中，認為全球化與等當下市場壓力並不會使這兩種資本主義向單一模式聚合，而是在不同政經邏輯下運作，可以調節以承受新出現的壓力。然而對自由化 (liberalization) 理論而言，全球化與經濟危機，以及新自由主義的流行，已經導致協合式市場經濟體中特定安排的崩解，而縮減了其與自由式市場經濟體之間的差異：因組織化工人勢力的消退與新自由主義的興起，雇主得以掙脫政治與社會的束縛，尋求更多彈性 (Thelen, 2012)。

不過，以上兩種巨觀理論均未提及二十世紀所出現的重大政治經濟格局變化。二十世紀末葉，製造全球化與全球化市場成為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之現象，開放的貿易以及製造業向勞動力成本低廉國家的轉移，使本地經濟暴露在高度的

競爭狀態，也增加了舊有受僱者的失業風險。因此，西方國家在二十世紀中後葉開始的福利擴張便被歸因於全球化的影響，政府為補償受全球化所影響的企業與勞動力，因此便以提高福利政策作為補償，因此，全球化導致福利擴張的理論也被稱為「補償理論」(compensation theory) (Rieger and Leibfried, 1998)。

二十世紀末，除全球化外，六零年代起出現的勞動市場去工業化 (deindustrialization) 也衝擊了多數西方國家的經濟格局。過去使美國得以稱霸全球、使西歐快速從戰爭瓦礫中復興的製造業就業人口，在產業外流以及因經濟發展、收入上升後的需求影響下，快速地由服務業所取代。因此，全球化導致福利擴張的理論受到去工業化論者的強力挑戰，認為福利的擴張並非全球化下的國際因素所導致，而是去工業化脈絡下，國內勞動市場風險上升所導致 (Iversen and Cusack, 2000)。這些風險來自特定工作部門，如舊有製造業與本地經濟之間的互動關係。由於製造業工作者常須擁有專業的工作技能，因此其轉移性 (transferability) 較低，在就業市場格局改變下，這些失去工作者也較難找到新工作。為面對這些新的社會難題，西方國家開始大幅擴張社會福利，以失業補貼、就業輔助計畫或是就業保護法案來保護受去工業化衝擊的勞動者。

上述研究成果雖揭起福利研究的濫觴，但樣本選取上卻過於集中已開發國家，中國自然也不被包含在研究樣本中。對經濟發展較晚的中國乃至東亞地區的福利體系研究，其實依循了與西方各國不同的路徑。

## 1.3 從東亞看中國：福利體系簡述

### 1.3.1 中國福利體系簡述

中國的福利體系有兩個主要兩個特色：即促進經濟發展，以及維持共產黨統治的合法性，其中，隔絕城市與農村居民的戶口制度使中國的福利供給體系一直呈現城市 / 農村的雙元格局。隨著國家福利體系的轉變，我們可以將新中國成立至今的中國福利體系區分為三個時期：中央計劃時期 (1949-1978)，經濟成長與市場化時期 (1978-2003) 以及和諧社會時期 (2003-至今) (Li, 2013)。

在改革開放前，中國的福利體系由職業所決定。城市居民由工作「單位」，農民則由集體農場負責供給住房、衣食、教育等必須物資。然而共產制度下的低生

產力以及該體制對黨員的優勢，使其理想中的平等社會變得遙不可及。而改革開放後，計畫經濟體系被放棄，中國的社會福利逐步往市場化方向前去。

改革開放後，為了提昇經濟的效率，並最終達到經濟繁榮的目標，市場化被認為是最有效的方法。在福利體系上，福利的供給逐漸與供職單位脫勾，九零年代初期至中期建立的多層社福體系便是要彌補這種福利的轉移。國有企業終身職（鐵飯碗）的終結、年金體系的建立、醫療保險制度以及房地產市場的改革，均是要使福利體系更適應逐漸市場化的經濟體系。從圖 1.3 中我們可以發現，中國的社會支出佔生產毛額的比重，由改革開放前期的近三成，下降至 1997 年的低點。同時，社會支出也多使用於教育及醫療<sup>4</sup>，其目的也在於降低民眾對於社會福利的依賴。

2002 年之後，日益增大的貧富差距、一胎化政策帶來的高齡化社會、農民工大量轉入都市後在鄉村留下的「留守人口」、城市迅速擴張所帶來的社會問題等，均對既有的福利體系造成極大壓力，因此，2004 年所提出的「建立和諧社會」便成為官方進行福利轉型的宣示。城市化、農業稅制與農村居民年金的改革、醫保與房地改革均是實際的政策反應，但這些舉措並未緩解基層的不滿，同一時期的集體抗爭數量成長了十倍，而為了應對 2007 年金融危機所施行的經濟刺激計劃，更促進了通貨膨脹，使本就高企的房價與物價高漲，也使地方政府為了要在房地產市場中獲利，而對農民進行土地的騙取或非法徵收，造成了更多的社會不平等現象<sup>5</sup>。總體而言，中國的福利體系仍屬於一種殘缺的國家福利體系 (residual state welfare)，僅僅提供調節市場的政策，但在實際福利的供給上卻鮮少有所作為。不過，中國雖仍是威權國家，但基層社會團體對國家所造成的壓力，依舊推動著中國政府緩慢地進行福利的改革。

上述對中國福利體系的描述，如對經濟發展的重視、在維繫政權上的重要性，甚至是轉型的壓力與轉型後的方向，其實都展現了與鄰近東亞國家的相近性。基於學界對「東亞福利體系」的研究更早，因此，我們能從對東亞福利體系的研究中得到啟發，並推及中國現有的福利體系。

<sup>4</sup>在 2009 年的政府支出中，教育佔有 13.7%，醫療支出佔 5.2%，而失業補貼部分，則僅有 0.2%。該比例自 1994 至 2009 年間均未有太大變動。

<sup>5</sup>2011 年震驚全球的「烏坎事件」即為一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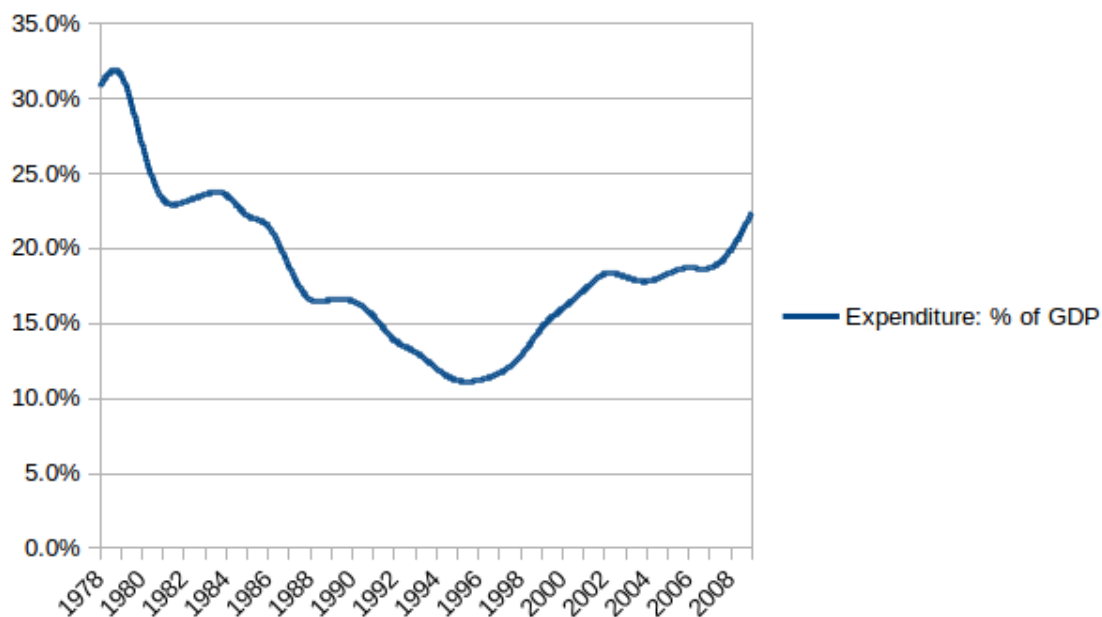


圖 1.3: 中國社會支出佔 GDP 百分比：1978-2009（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鑑）

### 1.3.2 東亞福利體系探源

相對於西方各國，東亞的福利體系有三大特色：首先，其支出較西方各國要低，其次，公民的福利權仍未被廣泛認同，非國家機構如社區與家庭仍被期待為福利的主要供給者。此外，相較於普遍性（universalism）以及即收即付（pay-as-you-go）的社會保險機制，東亞國家更傾向採行選擇性（selectivity）且由國家補貼的社會保險。(Goodman et al., 1998)


對於東亞各國的獨特性，結構主義者首開將東亞的福利體制發展路徑與文化結合的先例 (Jones, 1990)，認為家庭在其福利體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也將東亞四個虎經濟體：台灣、韓國、香港與新加坡歸類為「家戶式福利國家」(Oikonomic Welfare State)，其形成原因與該地區的儒家傳統有關，強調自助以及家庭與社區的重要性，而缺乏西方社會的主要力量如教會、工會參與與自由主義理念等影響。儒家傳統不僅型塑其當下的福利體制，也決定了該體系未來的發展。在儒家觀點中，政府並沒有回應民眾需求的必要，強調的反而是政府的管理層面，因此導致在福利的供給上，政府的角色微弱，而形成以家庭與社區為主要服務機構的社會福利體系。但該觀點被批評為過度強調東亞各國的共通點，而未能處理各國間的個體差異。相較於韓國與台灣，新加坡與香港更像是採取自由經濟的城市國

家，而新加坡又有多民族的問題，此外，韓國與台灣則由政府介入市場，選擇出口導向經濟為主的策略，但韓國以大型財閥為主的產業結構，又與以中小企業為出口主體的台灣顯然不同。

不過，儒家意識型態的確得以成為統治階級應對內外壓力的現成工具，其中自助與重視家庭的倫理使政府能有效動員家庭、特別是女性的力量，來達到社會對福利的需求，而不需付出危害市場導向政策的成本。縱然東亞個別國家間福利體系的發展路徑存在眾多差異，但「儒家福利國家」(Confucian Welfare State) 觀點依舊成為往後許多論述的基礎，在討論東亞福利體系的背景、發展與展望時，儒家思想依舊擁有重要的影響力 (Walker and Wong, 2005)。過去，對西方福利體系的分析多著重於隨民主帶來的公民權與因資本主義而來的財產權，然而對東亞國家而言，對經濟成果的追求與政權的合法性，才是福利體系的核心，相較於西方針對政治過程的分析，對東亞的分析必須聚焦於國家的角色，且相較於去商品化，東亞更著重於福利體系的發展性 (developmental) 層面。縱然東亞各國除儒家傳統之外，在政經社各層面均無一致性，發展的特色也不同，但在社會政策上均有低支出、低福利、教育優先與政府僅作為管制者的特色。因儒家傳統常被用以為政治體制提供合法性，在政府提出福利政策時，也時常將儒家傳統概念做為政策出發點，因而使東亞福利體系可以儒家概念來概括論之。

然而，亦有觀點認為抑制東亞福利體系發展的原因並非儒家價值，而更可能是東亞國家特有的發展途徑、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型態、威權主義、殖民遺績、種族與性別因素所形塑而成。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東亞各國受到市場意識型態很大的影響，使其得以創造了對勞動者不利，但極利於資本投注的環境 (Chau and Yu, 2005)。由於社會福利在東亞處於低度發展的狀態，而此狀態帶來經濟發展上的成功，因此社會福利將持續受到壓抑。此外，該地區的儒家價值也受統治者的利用，而抑制了社會福利的成長。

由於儒家價值在概念上的廣泛性、政權遭遇與西方相同的社會危機，及掌權者對儒家價值的選擇性理解，而使本與社會福利的建立並無矛盾的儒家價值，因統治者的需要而成為抑制社會福利成長的擋箭牌。以香港為例，香港殖民政府雖一直強調傳統價值中家庭與自立的重要性，以避免社會福利的支出，但基本上對傳統採取遠離的態度，且隨資本主義的成長，儒家傳統對家庭與婦女的概念也逐



漸式微。回歸後，特區政府雖也極力提倡傳統價值，但也未有實際行動。而中國，雖在改革開放後重新擁抱儒家傳統，但主要仍是為了藉由儒家價值來強調其維繫政權所必要的集體利益、權威與思想教育，並據以反駁西方的人權標準。在 1997 年面對東亞金融危機的衝擊時，兩國政府也以教育取代直接的現金補助，或將社福支出移作投資用途以維繫經濟活力，因此，從實際層面來看，兩國政府並非真以儒道治國，而是以市場主義為其基本信條，「儒家傳統」只是統治者的藉口，以規避更大規模的福利擴張。

另一種觀點則是延續對東亞政治經濟的研究，為發展型途徑（developmental approach），該途徑認為，在東亞虎經濟體中，「不情願的福利主義」（reluctant welfarism）是決定福利政治的決定性因素（Midgley, 1986）。社會福利的成長是為了達到高速經濟成長的發展目標，因此必須保證低製造成本，這反映在低薪資與稅收及彈性但偏長的工作時數中。大部分的政府政策集中在產業的發展而非社會發展，而經濟的增長又有向下傳遞的效果，因此強調對勞動力的教育與健康的投資。這些發展型國家的特色在於很少的政府支出、相對彈性的勞動市場，及將社會安全著重於政治上重要的利益團體上（Tang, 2000）。對此現象，Ian Holliday 利用 Esping-Andersen 的分類方法，將東亞界定為第四個福利世界：生產主義福利體制（productivist welfare regime），認為東亞國家的社會政策鑲嵌於經濟政策中，是為了達成經濟成長、政治與社會穩定及人力資源的發展。此外，他也將東亞再區分為普遍型（developmental-universalist）的日本、韓國與台灣，特定型（developmental-particularist）的新加坡與輔助型（facilitative）的香港及三種亞型（Holliday, 2000）。而這些國家對於教育與健康的投資也無非在反應增長經濟的策略。

總結上述，東亞既有福利體系的特色，學者認為來自於傳統儒家政治文化或發展型國家的經濟主導傾向，而呈現「最小福利國家」的型態。不過，東亞等國在二十世紀末面臨了許多重大的政治經濟與社會層次的變革，如民主化，金融危機以及少子化，高齡化等改變，這些衝擊同時也改變了福利體系的既有面貌。雖然這裡所敘述的對東亞福利體系及其成因的研究，特別是「發展型途徑」的觀點，針對的主要是東亞數個經濟發展較早的國家，而忽略了對中國的分析。但如前述，中國經濟與不平等的高速發展，及中國本身的重要性，使其逐漸成為倍受關注的

研究焦點，而中國當下所遭遇的危機，東亞諸國也曾遭遇過，也因此需要進行福利體系的轉型，是故，我們仍有必要再次關切東亞其他國家在福利體系上的轉變路徑。



### 1.3.3 東亞福利轉型：變革與挑戰

先前提及，經濟的全球化現象對既有福利體系帶來挑戰，隨之而來的成長率趨緩、失業率上升，除了西方國家外，也挑戰了過去東亞福利體系中對個人與家庭的依賴，政府同時要維持其勞動成本上的比較優勢，又必須維持偏低的福利與勞動支出。面對該兩難局面，東亞各國多以新自由主義應對，順應市場情勢並增加對私人部門福利供給的依賴。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韓國雖受國際貨幣基金與世界銀行的政策指引，但金大中政府時期的福利擴張卻多站在反新自由主義的立場。

不過，亦有學者認為即便歷經危機，東亞的社會政策依舊維持其生產主義式的原貌 (Holliday, 2005)。由於在 1997 金融危機中，僅有韓國受到較大衝擊，而社會政策仍受到政治很大的影響。即便台灣與韓國有些全面性的改革，但這些新體制仍有許多限制，這些限制也依舊建立在持續促進經濟發展的目標上，因此先前所提的「生產主義福利體制」依舊適用於描述東亞國家的福利體系。

對既有的社會福利體系而言，1997 年的東亞金融危機是對其試驗的一大挑戰。在韓國，當失業率迅速飆升後，過去針對在業勞工的福利體系完全失去安全網的作用，因此，在危機緩解後，韓國出現了過往未有的全面失業補助與對最低生活水平的保障。而台灣雖未受危機衝擊，也在 90 年代末期施行了全面的醫療保險與失業基金，其中，國家更扮演主要的資金提供來源。相較於台灣與韓國的改變，新加坡與香港則保留了大部分基於財力審查與自我貢獻的福利體系。針對發生在東亞四小龍中的兩種分歧，有學者認為原因在於發展過程中所形成既有的經濟結構差異。(Kwon, 2007) 韓國與台灣的產業發展均建立於大規模的政府介入，及產業的垂直整合。而香港與新加坡則更市場趨向的國際轉口港為主。在遭遇經濟危機時，台灣與韓國必須進行其經濟上的結構改革，以應對比較優勢的流失，而民主化後的選舉考量也使兩國傾向全括式 (inclusive) 的福利發展，以期納入大部分國民。新加坡與香港則因既有發展策略得以安然度過危機，因此缺乏改革誘

因，而相對威權的政府體系更使其保留了選擇式 (selective) 的福利體系。

在結構論觀點之外，歷史與制度論者由行為者基礎 (actor-based) 的觀點，分析東亞社會福利體制的形成與發展，認為民主化後，民主選舉中的政黨競爭及社會運動的壓力，是台灣與韓國大幅增加社會福利的主因 (Aspalter, 2006)。過去，社會福利的推展主要是反應威權政府為了維繫合法性的手段，而在民主轉型後，政府必須面對來自社會的需求。此外，社會福利無論在質或量都出現擴張，而且多是全面性的政策，如全民的醫療保險或失業救濟，而不將勞動力區分為特權與無權階級。

以上的觀點，無論是結構論所強調的文化因素或歷史制度論引入的民主化因素，甚至是前述描繪西方福利體系所提出的社會聯盟、面對協和問題的立場，或是面對全球化或去工業化所受的就業衝擊等因素，其實都建基於社會上個人對福利需求的差異，而這些差異也來自個人所接受不同誘因的影響結果。因此，要補足以上總體因素的解釋，本文認為必須自個體層次出發，討論個人對社會福利的需求起因於何，又將受哪些因素左右。因此，在接下來的部份，本文便是要更進一步，除補足既有研究未能包括中國的問題外，更要以個體調查資料，來檢證東亞傳統文化中的儒家價值以及經濟自利等因素對中國民眾福利需求的影響。

## 1.4 研究資料與方法

本研究資料來源為《亞洲民主動態調查》(Asian Barometer Survey, ABS) 的中國地區調查資料。在資料分析的部份，則將以二元勝算對數模型 (binary logit model) 計算自變項與控制變項對依變項的影響程度，並以勝算比 (odds ratio) 表現其個別影響力。本研究用以進行模型統計檢定的軟體為 Stata 12。

## 1.5 章節安排

在前面的概述中，已經初步闡明本論文的研究動機與背景，及所要研究的問題、既有文獻的結果與本文所要採取的論點，接下來是本論文預定的組成部分。

緒論中除闡述本論文目的與背景外，亦將簡述福利體系成因的巨觀解釋，以及東亞福利體系之特殊性。第二章則為本研究的理論基礎，詳述影響個體層次福

利偏好的一般化模型，以及一般化模型中無法含括的其他因素。本文強調非經濟因素對福利偏好的影響，其中，儒家傳統價值與現代福利國家藍圖的相近性，使本文提出可供驗證的研究假設，即儒家價值將強化個人對福利國家的偏好。

第三章則為研究設計，說明本文的研究單位與各概念的操作型定義，並建構假設模型的依變項與自變項。最後一部分則說明實證模型的內容，以及檢證模型的統計方法。

第四章與第五章則呈現研究結果，第四章將回答本文的主要研究問題：儒家價值是否對個體福利偏好有正向影響？本文利用勝算對數模型計算出各因素之勝算比，並藉此說明儒家價值對福利偏好的效果。第五章則總結研究結果，闡述影響中國民眾福利需求之因素，並對既有一般化模型的假設提供再思考的方向。

第六章則為結論，將總結本文研究發現，並對本研究之限制與未來展望提出說明。

#### 論文章節安排：

### 第一章 緒論

-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 第二節 主要論點與研究發問
- 第三節 福利體系成因與轉型
- 第四節 東亞與中國福利體系簡述
- 第四節 研究資料與方法
- 第五節 章節安排

### 第二章 理論與研究假設

- 第一節 福利偏好的一般化模型與影響因素
- 第二節 非經濟因素與福利偏好
- 第三節 儒家價值中的福利國家
- 第四節 研究假設

### 第三章 研究設計

- 第一節 研究資料與分析單位
- 第二節 變項說明
- 第三節 實證模型與統計方法



#### 第四章 實證分析

——第一節 敘述統計

——第二節 單變數關係

——第三節 儒家價值與福利需求的邏輯斯迴歸分析

#### 第五章 結果與討論

——第一節 經濟與非經濟因素

——第二節 儒家價值的影響

#### 第六章 結論：文化遺緒與福利國家

——第一節 自個人到國家：福利轉型的關鍵

——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未來展望



## 第二章 理論與研究假設



### 2.1 福利偏好的一般化模型與影響因素

對於如何解釋社會福利在二十世紀大幅擴張的現象，除了前一章中所提及的總體層次論述外，基於經濟學而起的理性選擇理論者則選擇了將分析個體由宏觀的國家層次下降至個人層次，認為政治世界更多是來自與結構無關的個人行動者所形塑。而個人選擇與宏觀的政策產出之間的連結劑，即為「中間選民理論」。藉由中間選民理論，我們可以預測在民主政體中，一國內每一個人對福利政策的偏好，將決定該國福利體系的擴張與否。當人們認為社會政策有利於己時，則當然更會傾向選擇福利擴張。而競爭中的政黨會選擇偏向社會中暫多數民意的政治位置，以求攫取最多選票，因此，社會上多數民眾的社會政策偏好，也就將影響社會政策的產出。基於以上假設，政治經濟學者得以建構一般化模型，並解釋使人們趨向更多社會福利政策的因素。

在個體社會政策偏好的研究中，有三種建基於中間選民理論的主流途徑：分配模型（distribution model）、保險模型（insurance model）、與資產模型（asset model）（Meltzer and Richard, 1981; Moene and Wallerstein, 2001; Iversen and Soskice, 2001）。這三種模型的前提在於人們理解社會政策的效果，也理解該社會政策的資金來源是來自自己所繳納的稅款，因此這些福利並非「白吃的午餐」，人們必須評估自己在社會政策下的得失，再抉擇自己所想要的福利程度。

首先，分配模型建立在中間選民的收入與平均收入水平的距離上，當中位選民收入越少，離平均收入越遠，則選民將傾向偏好較高的稅率，以達到重分配效果。其次，保險模型則認為，人們規避風險（risk aversion）的傾向將影響人們支持社會保障的偏好。該模型的預測結果與分配模型恰恰相反，當人們越規避風險，則越高的收入將導致越高的風險，因此高收入者反而更支持社會政策。最後，在資產模型中，社會政策除了先前分配模型所提及的重分配效果與保險模型的避險效果外，個人工作技能的組成，其專業或普遍與否（skill specificity），將決定個人對社會重分配的支持程度。在控制個人所得多寡的前提下，擁有高度專業技能的工作者，由於其不若擁有普遍工作能力的個人般容易更換工作，因此擁有較高的

失業風險，而導致這些高專業者更為支持社會政策。這三種模型背後的誘因並非完全互斥，對個人而言，社會政策不會僅有重分配的效果，也是對未來風險的一層保障。

上述模型的效果亦受到實證資料的驗證，首先，在因果鏈上，一國政府的社會政策，如增加就業安全的勞動法案以及失業救濟的預算規模，都將降低影響勞動者對於未來失業的風險，以及重新找尋工作的不安全感 (Andersen and Potusson, 2007)。此外，三種模型對於社會政策內涵的理解也非完全不相容，一般民眾對於福利政策需求的來源，除了對於所得重分配的需求外，也同時有對於自身所得來源的風險規避層次，因此我們不能完全區別兩種對社會福利的觀點 (Rehm et al., 2012)。社會福利政策有其風險規避的效果，而該風險的來源來自於就業，然而，在分析的層次上，我們也必須區辨職業風險的來源為何。根據資產模型，我們預期職業所需的專業程度將影響個人的福利偏好，而該專業程度是沿著該職業的就業部門 (occupation)，而非所在產業 (industry) 分佈。因此，身處不同的就業部門的個人，也將有不同的福利偏好，當我們在研究產業結構的變動對福利偏好的影響時，必須注意的也是個人所處的部門，而非過去研究中多被納入模型的產業類型 (Rehm, 2009)。

不過，基於就業部門工作技能的模型近年來也受到實證資料與理論上的質疑 (Emmenegger, 2009; Nickelsburg and Timmons, 2012)。資產模型指出，擁有特殊技能者因面臨失業後更換工作不易的風險，因此將有更高的福利需求。但社會常見的實況卻是有特殊技能的受僱者反而因更難以被取代，因此更不會在乎失業的危險性。後者即為社會學者所提出的「替換理論」(replaceability thesis) (Goldthorpe, 2000)。替換理論建立在階級理論的基礎上，但與資產模型相同，均依照個人的就業部門為受僱者歸類為七種階級。依照替換理論，擁有特殊技能的受僱者因其工作內容難以被雇主監督 (monitor)，因此有更高的不可替代性，因此面臨較低的風險。實證研究的結果也顯示，無特殊技能的白領受僱者更傾向支持就業安全法案，因此，替換理論比資產模型更好地預測了受僱者對就業安全法案的偏好。

在理論模型的部份，資產模型也因控制了個人所得以及不同技能群體的失業率，而忽略了工資水準對失業風險的補償效果。當動態模型中加入了工資水平後，由於工資調控了個人對特定職業技能的投資與失業後的風險，因此導致職業技能


的高低實與社會福利偏好無關。就業市場的許多限制，如特定行業的進入壁壘或對雇主資遣員工的限制，均將影響模型的均衡，而改變職業技能對福利偏好的影響。在引入動態工資與失業率後，資產模型所描述的狀態僅是特定市場失靈的結果，如面對熊彼得式衝擊（Schumpeterian shocks）或對特定技能的投資加以設限的就業市場，而非一般運作良好的資本主義社會中會出現的一般狀態。

而基於以上模型，我們得知收入的水平與失業的風險是兩個驅使人們支持福利政策的主要驅動力。因此，學界也積極尋找藉由兩路徑增加個人福利需求的外在因素。首先，「全球化」對既有產業結構的衝擊，吸引了學界的注意。根據模型的因果鏈，我們關切的是全球化是否會增加勞動者的風險，而評估產業全球化的尺度則是該產業的對外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比例。當該產業對外投資越高，則越有可能將舊有本國之內的生產基地轉移到勞動力低廉的海外地區，而導致本國勞動者失業。從針對英國工人的長期研究結果中發現，勞動者所在產業的對外投資比例，的確會增加勞動者的經濟不安全感 (Scheve and Slaughter, 2004)。此外，除了既有的因果鏈外，產業的全球化規模也將直接增加勞動者對左派政黨的認同，而直接增加個人對福利的需求 (Walter, 2010)。

## 2.2 非經濟因素與福利需求

既然福利政策的效能在於降低人們對未來風險的焦慮以及平衡所得分配不均的問題，則擁有相同效能的社會機制，如宗教的精神與社會效果，將降低民眾對社會福利的需求。除了在宗教認同程度較高的國家，其福利支出較低外，對個人的實證資料分析也證實，社會福利與宗教參與是兩種降低不良生活事件導致精神成本的機制，個人宗教參與率愈高，則對社會支出的支持就愈低 (Scheve and Stasavage, 2006)。我們看到，除收入與就業風險之外，宗教也提供了另一個改變個人福利偏好的因素。

除了個人對總體福利政策的需求外，基於理性選擇假設，人們對於不同層面的社會福利政策也將有不同的偏好。例如針對孩童與家庭的福利政策，對於即將或正在養育幼年子女的中、青年人而言，是相當切身的補貼，然而，該需求將隨著個人年齡的漸增，由於不再有其需求，且假設政府支出為一定值，則對幼年孩童的福利政策將壓縮自己的老年福利，而失去對己的功利，因此，對該福利政策



的偏好將隨年齡而下降。然而，人們並非完全是汲汲營營算計自身功利的動物。對制度論者而言，社會規範與文化因素也將型塑人們對於社會規範的想像。道德、不公平與不平等等觀點也將影響人們對於政府干預的看法。因此，除了上述基於理性選擇理論建構的模型外，我們也不該忽略被個人內化的態度與規則，與其對福利偏好的影響。因此，基於制度論，可以預期對於孩童愈重視，家庭價值愈高的個人，也將更支持針對孩童與家庭的福利政策。根據對於德國民眾的調查資料分析顯示，該家庭價值亦將扭轉年齡漸長帶來的理性計算效果 (Mehlkop and Neumann, 2012)。

而個人與福利體制的互動，也將影響個人對「公平」的看法，而使個人福利需求與既有福利體制得到相互加強的效果 (Alesina and Angeletos, 2005)。如美國與西歐福利體系的差異，同時也加強了民眾對於市場結果與所得來源的看法：社會開支較少的國家如美國，由於所得的分配較少，使更多民眾認同收入是來自個人努力的結果，貧窮則是來自自身的不作為，因此也就更沒有要求重分配的需求。反之，西歐國家有較多的社會開支，同時也就增加了個人不勞而獲的機會，使更多民眾相信收入更多是來自機遇，而貧窮則是社會結構造成，而加強了重分配的需求。因此，人們對於何種分配方式才是「公平」的觀點，也將影響福利需求，甚至加強了既有的政策產出。另外，這種信念不僅僅是來自當下的經濟或是政治狀態，在塑造個人信念的過程中，過往的生活背景往往扮演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同時也決定了此時此刻對於社會政策的需求 (Piketty, 1995)。

迄今對個人福利偏好的研究，主要建基於理性選擇理論的基礎，並依經濟功利建構一般化模型，視社會福利為所得重分配或規避經濟風險的工具，因此，影響因素便為個人所得與失業的風險。然而，個人對福利體系偏好的絕非僅是當下經濟因素的影響結果，我們也從實證資料中發現，精神上的宗教或家庭價值，都將改變個人的算計，而個人在成長過程中塑造的信念，也將影響人們對社會福利的支持。基於過往研究對精神層次因素的忽視，使我們有更多得以切入之處，而這些精神因素與福利體系之間，也絕非毫無關係。在歐美影響仍深的宗教因素，被證實的確將改變個人對福利支出的觀點，那在宗教背景薄弱，共產主義價值又強加於上三十餘年的中國，又是哪些因素能有其特殊的影響力，在所得與經濟風險之外，改變人們的福利偏好？在本文中，我們認為是儒家文化。



## 2.3 儒家價值中的福利國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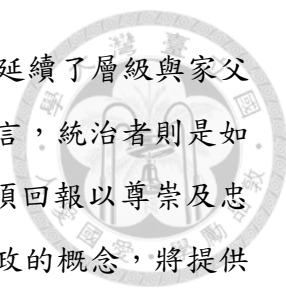
根據基於理性選擇假設的一般化理論，我們預期個人的經濟地位與職業風險將影響民眾的福利偏好，在這個層次上，人們循著理性計算對己功利的理路，評估福利政策對自身的好處。然而，根據先前的回顧，我們也知道，在影響理性選擇的經濟因素之外，內化的文化與規範因素，也將影響民眾對政治安排的看法，其中自然也包含對於福利國家的偏好。不同的文化偏好（cultural biases）、社會聯結型態（patterns of social relations）與行為策略（behavioral strategies）均可視為不同的視為「社會連帶形式」（form of social solidarity），這些形式便是一種連結人群，先天決定人際之間關係的可行方式。此外，包含於其中的信仰與價值更是用以解釋經濟、環境、地理、組織與政治的必需構成要素 (Thompson et al., 2008)。

而在中國，最為核心且最有延續性的社會連帶形式便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與福利體系的關係自 Jones 的「家戶式福利國家」始被提及，爾後也在東亞福利體系分類學與體系解釋中一再被強調，被視為是植根最深、影響東亞民眾最重要的文化遺蹟。本文目的便是要檢證在個體層次上，儒家價值是否型塑了中國民眾的福利偏好，儒家的眾多觀點又是如何形塑東亞民眾對國家社會政策的看法。

過去的研究中，儒家文化常被視為是限制福利體系擴張的主因，但本文則提出不同的觀點，認為儒家文化中存在許多構面，而多數儒家價值對民眾福利偏好並無侷限效果，反而促使民眾更傾向政府對福利的供給。在此我利用韓國學者 Doh Chull Shin 所提出的分析架構 (Shin, 2011)，將儒家價值區分為「家父長制功績主義」，「社群主義」，「家庭主義」三大構面，並針對各個構面中所含要素對福利需求的影響提出研究假設。Shin 的研究主軸雖為儒家價值與民主化之間的關聯，但其將「儒家價值」由傳統文本整理為一得以與調查資料相互應證的統合結構，適合被用於本文所要進行的個體資料分析。此外，本文也將以 Shin 的研究中所採納的問卷題目作為回歸模型自變項，進行分析。

### 2.3.1 家父長制功績主義 (Paternalistic meritocracy)

家庭是儒家理想政府形式的核心，在家庭生活中所必須實踐的孝道與仁禮也適用於統治者與被治者之間的關係，家長與子女成為君臣關係的對照，須「君君，



臣臣，父父，子子」，才有成就好國家的可能。儒家的統治關係延續了層級與家父長原則，統治者首先被要求要修身齊家才得治國，而對人民而言，統治者則是如同家長一般的「父母官」，提供人民所需的福利，而人民也必須回報以尊崇及忠誠。在此構面中包含善政與賢人政治兩者，其中，儒家對於善政的概念，將提供人民對福利國家的想像。

賢人領導也是儒家理想的重要概念。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其理想不在於繼承政治，而企望有德之君子帶領國家，領導者必須「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在其理想中，一國之治權應交付給賢能有德之人，形成一種道德統治的形式。此外，我們也可以依循孟子自性善論出發的「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而推及若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心之王，則「足以保四海」的仁政觀。而其中惻隱之心更是四心之首，且唯有使民「穀與魚鱉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才有「王道之始也。」故我們能看到儒家傳統觀點中，對於家父長制善政要求的，便是以同情心出發，使諸民富足的仁愛政治。

在儒家傳統中，好政府的形式如同功利主義者的觀點，統治者必須提供人民生活所需，才得以長久存續，論語中「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便是儒家對於福利國家形式與對其需求的具體表現，唯有達到平等，使人民滿足，國家才得以長治久安。而對於必須受政府照顧的社會群體，孟子也提出「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要發政施仁，始於四者。我們可以看到儒家的社會福利目標並非自由主義式的最小國家，政府必須介入並關懷人民的生活福祉，其目的，正如禮運中所述「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的大同社會。

本研究利用 ABS 中第 75 題與第 141 題捕捉儒家價值中的家父長主義。其中對政府及政府領導人的角色對照了儒家價值中的「家長」，並認為政府應當替民眾決定何者對其是好的。題目原文如下：

1. 仁慈的家長：「如下兩段話中，您更同意哪一種說法？1. 政府是人民的公僕，應該由人民告訴政府要做什麼；2. 政府就像父母一樣，應該替我們做決



定。」

2. 無條件服從：「政府的領導人就像大家庭的家長，他們關於國家事務的決定，人民都應該服從。」

儒家價值中的家父長制善政的目標近似於現代福利國家的願景，無論是老幼者的福利或中壯年者的工作權，皆可在儒家典籍中被發現，使國家積極介入並改善人民生活。因此，本文假設該構面中家父長制價值將促使人們對福利國家有更高的需求。

假設一：家父長制價值對福利偏好有正向影響

### 2.3.2 社群主義 (Communitarianism)

儒家傳統下的市民社會與社群生活不同於西方自由主義模式，相較於西方以個人為主的多元主義社群概念，儒家觀點強調的不是競爭而是群體的和諧，企求達到「大同社會」的目標，所追求的是「中庸」之道。在這種社會連結中，個人處在不同的人際關係中，肩負著許多與對方有關的責任，個人必須以群體或宗族的利益為優先，相較之下，以個人的利益為優先者則會受到譴責。此外，在儒家傳統下，唯二的社會團體便是國家與家族，兩者必須協同來創造民眾的福利。個人與個人，個人對團體或是團體對國家之間的衝突並不被鼓勵，個人之間的關係是相互依賴與扶持，而非西方的個人自主與為自身的利益而競爭。因此，在個人權益之外，儒家更強調團體的利益，認為君子應當「脩己以敬」、「脩己以安人」，藉由成就他人的利益來鍛鍊自己成為君子。這種對於和諧的渴望，使儒家社會更強調合作與共識的價值。

本研究中以第 51 題與 58 題捕捉社群主義價值，其中包含為群體犧牲個人利益與求取團體和諧兩意涵，題目原文如下：

1. 為群體犧牲：「為了集體的利益，個人的利益都可以犧牲。」
2. 求取和諧：「為了集體的和諧，我們應該避免和其他成員發生公開衝突。」

由於社群主義牽涉了個人之間與團體之間的互動，過去研究中，多認為東方傳統社群生活將降低國家的福利供給，在緊密的宗族或地方社群網絡下，這些團體代替了國家來提供該有的社會福利。此外，在缺乏西方強大的社會團體與社會

運動的脈絡下，儒家福利體系將缺乏民間的自主需求，而導致弱福利國家的出現。然而，學者們卻也忽略了前述儒家價值中犧牲個人利益換取社會和諧的觀點，由於集體的利益與責任先於個人，儒家社會雖無西方的多元主義傳統，亦無利益團體或權益的概念，但隨善政的基礎在於使人民有用有養，以及個人願意犧牲自我利益成就集體的價值，儒家觀點將使個人傾向選擇能照顧到更多人的選項，而非認為人應自生自滅，因「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人在協助他人的同時，也能得到受他人協助的回報。此外，孟子也曾提及「惻隱之心，人皆有之... 惻隱之心，仁也」。這種同理心的概念近似於 John Rawls 對正義的思想實驗，這些儒家價值將使人們在現代社會更傾向選擇福利國家。因此，本文假設儒家社群主義反而將促使福利需求擴張，而非限制福利需求。

假設: 儒家社群主義價值對福利偏好有正向影響

### 2.3.3 家庭主義 (Familism)

如前述，家庭在儒家價值中是界定一切人際關係的基礎，儒家五倫中有三倫與家庭成員有關<sup>1</sup>，此外，孔子也將孝道視為最高的道德標準<sup>2</sup>，而其美德標準也與家庭息息相關，如孟子所言之「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相較於西方的個人主義傳統，儒家價值使人以家庭成員的利益為最終依歸，而家庭成員也必須聽從族中長者的意見，家族事務必須共同決定，而非交由個人抉擇。

儒家的家庭主義也影響了人們在家庭以外的生活，使人們沿著親戚關係的遠近來區別個人對自身的重要性，我們也可以說，儒家的「仁」即是一種差序之愛，該差序格局使人們有強烈的內外之分，對於家族之外的成員信賴感較低，也傾向對家族成員給予更多的關注與好處，也形成東亞地區常見的裙帶關係網絡。在此脈絡下，宗族成為儒家社會唯一有效的利益團體，同時家族成員的生活狀態也成為每個成員的責任，成員之間必須相互扶持，共同照顧，而對家庭成員的尊重與關懷也成為個人重要的社會責任。

因此，在儒家文化的影響之下，家庭作為生活的中心，一直以來提供了民眾

<sup>1</sup>如中庸：「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

<sup>2</sup>如這個以法治標準看來不可置信的評論：「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子隱、子□父隱、直在其中矣。」

一定程度的社會福利功能。在家庭的庇蔭下，個人的經濟風險得以被家族成員所分攤，而有風險規避的效果。同時，家庭也作為扶老攜幼的主要社會團體，有家庭的奧援下，個人可以獲得對家中長者或幼年子女的照護，而無後顧之憂。在家庭式福利國家的假設中，也提及在儒家文化下，政府並沒有回應民眾需求的必要，強調的是政府在社會各層面的管理作用與家庭的照護功能，因此在該價值影響下，民眾會更將個人的福利視為是自己而非政府的責任。依此推論，在福利供給的角色上，「國」與「家」兩者實可以是相互取代的兩種機制，故人們對傳統家庭價值越重視時，則會越將福利視為家庭照護的產品，無需政府供給。

然而，基於社會福利體系的現代性，在此我們需要將中國社會的現代化納入考量。隨著產業的工業化以至去工業化，以及政府強制執行的一胎化政策所導致的少子女化與高齡化現象，在小家庭的興起、扶養比的攀升以及女性勞動力的解放後，均使既有家庭的福利供給功能大受破壞。在此同時，為彌補家庭成員在家庭福利功能消失而蒙受的損失，家庭價值越高的個人將對福利國家有更高的需求，藉由引入國家來填補該福利真空，而使家族成員仍享有福利照護的功能。該假設正如前引之研究 (Mehlkop and Neumann, 2012)，家庭價值越高的個人將更優先支持福利政策。

本研究中以第 50 題與第 55 題捕捉家庭主義價值，其中包含為家庭犧牲個人利益與順服長輩不合理要求兩意涵，題目原文如下：

1. 為家庭犧牲：「為了家庭的利益，應該把個人的利益擺在其次。」
2. 順服長輩：「即使父母的要求不合理，子女仍應該照著去做。」

假設: 儒家家庭主義價值對福利偏好有正向影響

## 2.4 研究假設

綜合前述，本文研究主軸為儒家價值對個人福利偏好的影響。基於儒家價值對國家的理想與現代福利國家藍圖的相似性，及儒家價值中的「他利」因素，本文假設兩者的關聯並不如過往對宏觀福利體系的研究，認為儒家價值與社會福利的需求是負向關係。反之，本文認為儒家價值將增加個人的福利偏好。故總結上述，本文研究假設為：**儒家價值將增加個人對福利國家之需求**



## 第三章 研究設計



### 3.1 研究資料與分析單位

本研究資料來源為《亞洲民主動態調查》(Asian Barometer Survey, ABS)的第三波中國調查資料。該調查是於2010年至2013年在東亞十三個國家所進行的調查計畫，由胡佛與朱雲漢教授共同主持，結合國內十多位學者與東亞地區多個國家的研究團隊，及多位國際學術界民主化研究的學者，在整合性的研究架構引導下，所進行跨國性的比較研究。而其中的中國調查則是一個面向全中國的訪問調查，執行的期間為2011年7月到10月，共有3473個受訪者資料，且該資料也經過了代表性檢定，並以性別、年齡、城鄉比與原抽樣框架下的各地區人口比例進行加權處理。除香港、澳門、新疆、西藏、青海、內蒙古、寧夏、以及海南各省之外，該調查共涵蓋了中國94.87%的人口。

基於訪問調查的資料形式，本研究以個體樣本為研究單位，將個人意向重新編碼，以利統計分析。然而，由於本研究使用的是既有的訪問資料，其原有問卷的內容，將無法完全合於我們後設的研究設計，因此在概念的使用上，我們僅能就現有資訊進行對照與契合，而變項的使用與詮釋，也需更進一步的解釋。以下便是本研究在進行統計分析時使用的變項。

### 3.2 變項說明

本研究最感興趣的應變數為個人對福利國家的需求。因此，本文在選擇變項時，利用亞洲民主動態調查中關於體制偏好的第77題作為研究依變項。亞洲民主動態調查雖未詢問受訪者對於重分配議題的看法，或對於個別社會政策的支持與否，但相較於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中「政府應當減少貧富差距」的提問，亞洲民主動態調查的問題方式避開了提出「貧富差距」四字所隱含的價值判斷，因此我們認為能更為保守地測量民眾對福利國家的需求（見Fig. 5.1）。此外，相較於World Value Survey中對於社會重分配政策偏好的問題，亞洲民主動態調查中雖未先提及個人所必須付出的稅收成本，但僅提供兩種選項而非與該政策的距離，將使研究者更容易進行操作化。在本研究中，詢問個人福利國家偏好的題組為：



### 研究依變項：

Q77. 請問您心目中理想的政府應該是什麼樣的。如下兩段話中，您更同意哪一種說法？

1. 每個人生活的好壞，應該由他們自己承擔主要責任。(編碼為 0)
2. 人民生活的好壞，政府應該承擔主要責任。(編碼為 1)

本研究中將研究依變項編碼為二元變數，即受訪者選擇選項 1 者編碼為 0，選擇選項 2 者編碼為 1。<sup>1</sup>自變項部分，由於我們在儒家價值三構面中均選擇兩道題目捕捉其意涵，故我們將每道題目依其回答為正向或負向分別編碼為 1 與 0，而每個價值構面所包含的兩道題目再相加而成為代表該價值的建構變數。此外，我們也將總計六道儒家價值題目的回答結果相加，建構出「儒家價值」總和變項。

在控制變項的部份，則依循我們前幾張的文獻回顧，納入可能的影響變項，如年齡、性別、家庭未來經濟展望、收入級距、城市與鄉村居民，以及對公平的看法等。<sup>2</sup>

以下我們羅列出本研究納入變項所使用的題目內容：

### 儒家價值變項：

#### 1. 家父長主義價值：

- 仁慈的家長：「如下兩段話中，您更同意哪一種說法？1. 政府是人民的公僕，應該由人民告訴政府要做什麼；2. 政府就像父母一樣，應該替我們做決定。」
- 無條件服從：「政府的領導人就像大家庭的家長，他們關於國家事務的決定，人民都應該服從。」

#### 2. 社群主義價值：

<sup>1</sup>另問卷中第 77a 題有追問受訪者對其選擇選項的同意程度，據此我們得以將依變項編碼為五級距變數 (-2, -1, 0, 1, 2)，依此進行之 ordered logit 分析。其結果我們將在附錄中呈現，其原因也將於附錄中敘述。

<sup>2</sup>本文本欲驗證保險模型與資產模型在中國的適用性，然而在第三波 ABS 調查中，大多數的民眾未能回答職業類別的問題，此外，相較於西方以受僱者為主的就業型態，多數受訪民眾也並非受僱者，而為農民或個人與家庭企業經營者。是故本文在經濟變數中僅能納入收入級距作為經濟變項。



- 為群體犧牲：「為了集體的利益，個人的利益都可以犧牲。」
- 求取和諧：「為了集體的和諧，我們應該避免和其他成員發生公開衝突。」

### 3. 家庭主義價值：

- 為家庭犧牲：「為了家庭的利益，應該把個人的利益擺在其次。」
- 順服長輩：「即使父母的要求不合理，子女仍應該照著去做。」

### 控制變項：

#### 1. 年齡：

- 請問您多大歲數？
- 分析中僅納入 20 歲以上，80 歲以下受訪者。

#### 2. 性別：

- 答卷者的性別
- 在此女性編碼為 1，男性編碼為 0。

#### 3. 教育程度：

- 您的教育程度？
- 將未受教育編碼與小學以下（含）編碼為 0，中學到大學以下（含）編碼為 1，大學以上（含）編碼為 2。

#### 4. 收入級距：

- 請問您全家的總收入是否可以支付您家的開銷？我念以下的句子，您看哪一項最符合您家的情況？
- 由於各地消費水準不同，故本研究不以絕對收入進行分析，而將收入程度依個人感受區分為四等級，依序編碼為 0, 1, 2。

#### 5. 居住地區：

- 鄉村地區編碼為 1，城市地區編碼為 0。



#### 6. 家庭經濟感知：

- 對未來的預期：您家的經濟情況五年後會有什麼變化？
- 將回答「跟以前一樣」者編碼為 0，依負面經濟預期程度將該變數編碼為 -2, -1, 1, 2，分數越高則對家庭經濟展望越悲觀。

#### 7. 對社會流動與經濟公平的看法：

- 一個人富貴貧賤，成功失敗都是天生注定的
- 選擇同意者編碼為 1，不同意者編碼為 0。

#### 8. 對全球化的看法：

- 請問您同不同意以下的說法：為保護農民和工人，政府應該限制進口外國產品？
- 請問您同不同意以下的說法：進口外國產品會損害地方經濟？
- 選擇同意者編碼為 1，不同意者編碼為 0。將以上兩題組再相加成為反全球化建構變數。

### 3.3 研究模型與統計方法

本研究將以卡方檢定檢證個別自變項與依變項之間的關係，再以邏輯斯迴歸分析 (logistic regression) 計算自變項與控制變項對依變項的影響程度，並以勝算比 (odds ratio) 表現其個別影響力。而在個人層次之外，本研究也將以多層次 (multilevel) 邏輯斯迴歸分析保留個人所在位置，即各省的差異，以估計地域的不同所對群體的觀點所造成的影響力。相較於一般將高層次群體轉為虛擬變項進行分析的方法，多層次回歸的優點在於得以個體與群體層次的變異來評估群體層次的回歸係數，也能更好地評估個體層次的變異量，不致忽略因群體層次因素所帶來的影響 (?)。本研究所採的多層次模型為可變截距的模型 (varying or random-intercept model)。

## 第四章 實證分析



### 4.1 敘述統計

進行統計分析之前，我們先對樣本進行敘述統計：在 3473 個可用樣本中，樣本平均年齡為 50 歲，我們納入的樣本年齡範圍為 18 到 80 歲的成年人（見表 4.1）；另外，研究依變數、性別、城鄉分佈及教育程度的次數分配表，則請分別參見表 4.2 與 4.3。另外，我們在後續進行統計分析時，由於調查資料對教育程度原本的區分太過細瑣，因此我們將教育程度重新編碼為三個類別（小學以下，高中以下及大專以上），再進行分析。在我們的依變數次數分配中，我們發現其實多數民眾對國家介入民眾生活並無興趣，僅僅只有約三成的民眾認為政府應當承擔民眾生活好壞的責任，而多數民眾則不認為國家應當對民眾的生活負起責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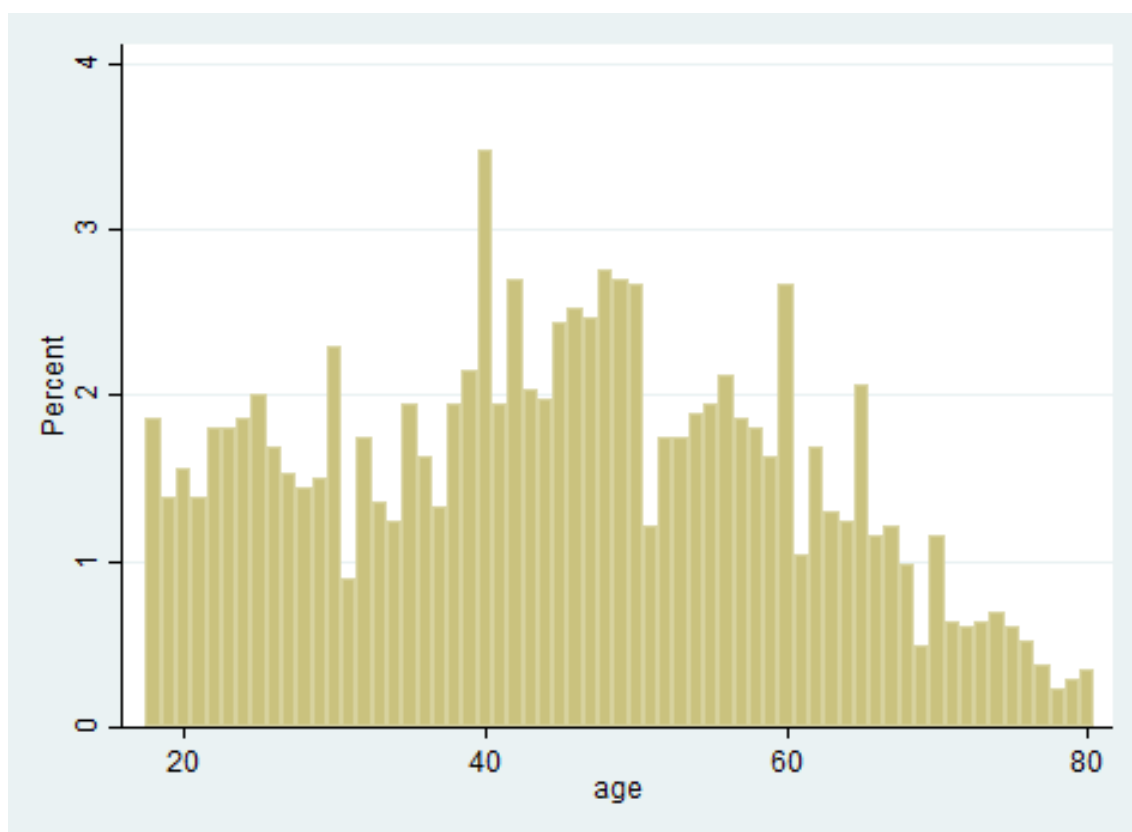


圖 4.1: 樣本年齡分佈

	Obs	Mean	Std. Dev.	Min	Max
Age	3446	44.99	15.32	18	80

表 4.1: 敘述統計：年齡



	Welfare Demand		Rural/Urban		Gender	
	Y	N	Rural	Urban	Female	Male
Freq.	1013	2460	1866	1607	1647	1826
Percent	29.17	70.83	53.73	46.27	47.42	52.58

表 4.2: 敘述統計：依變數、性別、城鄉分佈

Education level	Freq.	Precent
Under Primary	605	17.51
Over Primary	590	17.08
Under Secondary	212	6.14
Over Secondary	990	28.65
Under high school	73	2.11
Over high school	628	18.18
Part-time college degree	61	1.77
Full-time college degree	277	8.02
Graduate school	19	0.55

表 4.3: 敘述統計：教育程度

Variable	Yes	No
仁慈的家長	1452	2021
	41.81	58.19
無條件服從	1262	2211
	36.34	63.66
為群體犧牲	948	2425
	27.30	72.70
求取和諧	526	2947
	15.15	84.85
為家庭犧牲	409	3064
	11.78	88.22
順服長輩	2215	1258
	63.78	36.22

表 4.4: 敘述統計：儒家價值



## 4.2 儒家價值的因素分析

而為了了解我們所使用於捕捉儒家價值的六道題目，是否反應了中國民眾的「儒家價值」，因此我們也對這六道題組進行了因素分析，試圖探索這六道題目背後是否能分離出我們所指出的儒家價值，以及反映出儒家價值的三個面向。利用因素分析的主因素法（Principal Factor Analysis）進行萃取，並以最大變異法（Varimax）的正交法來進行轉軸。我們發現在 2011 年的中國調查資料中，我們藉由 Scree test 可以判斷出，從六道儒家價值題組中可以萃取出兩個比較主要的因子（且 eigen value 大於 1）（見圖 4.2），其中第一個因素有比較大的 eigen value，顯示有一個比較主要的因素，此外，檢定結果顯示其 KMO Value 為 0.6439，大於 0.5，而其 Bartlett's Test of Sphericity 值為 815.7，已經達到統計顯著，顯示這些變項可以用以進行因素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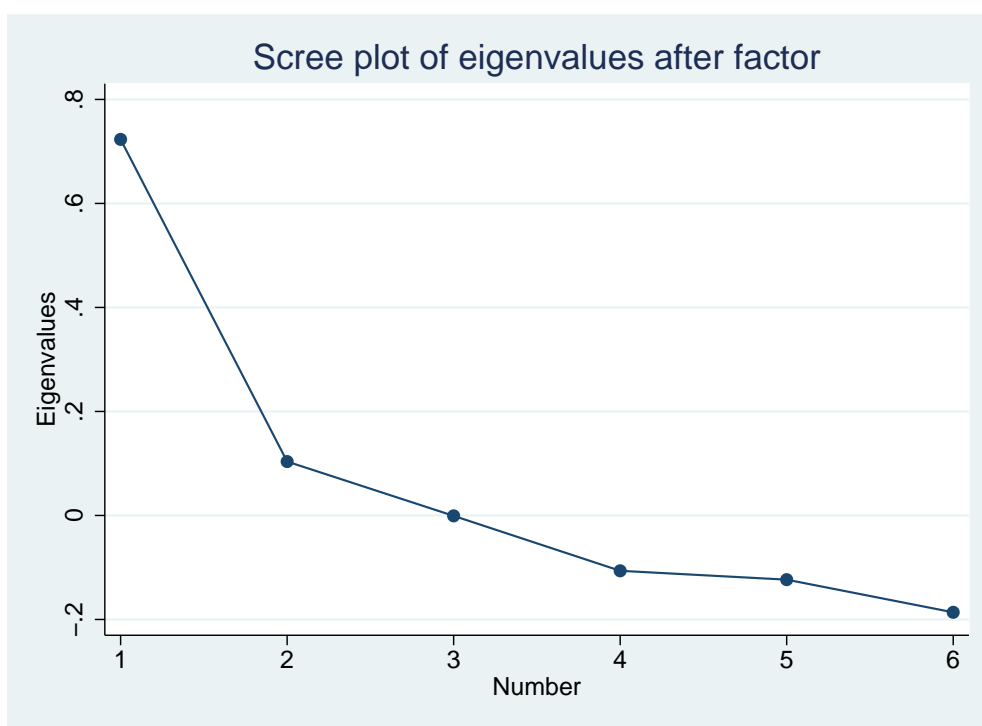


圖 4.2: 因素分析的 Scree test

得到兩個比較有意義的因素後，我們進行正交轉軸，而從轉軸之後的負荷量來看（表 4.4），我們發現從家父長價值的第二題「無條件服從」到家庭主義價值的「順服長輩」等四題，可以形成一個因素，然而比較令我們注意的是，這些變項在兩個因素中的負荷量都不是很大，而且也並沒有按照我們假定的三個面向形

成因素，甚至也沒有集中為一個潛在因素（即「儒家價值」）。不過，從我們前一節的敘述統計中也可以發現，其實在儒家價值變數中，在同一構面中的兩個題目裡，其同意與不同意的比例差異甚大，因此我們也可以預期這些題組在因素分析之下將難以形成同一因素。然而，基於我們研究需要的理論理路，儒家價值本就存在著多面性的特質，因此我們在以下的分析中，依舊將各子題集成總和儒家價值變數與三種儒家價值面向變數。不過，儒家價值題組在因素分析時所呈現的非均一現象，亦將對我們的分析結果產生影響，該影響我們也將在後文進行討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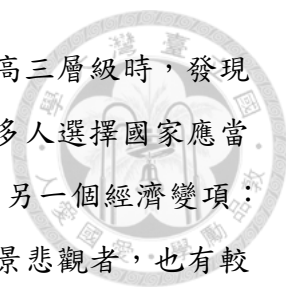
Variable	Factor analysis	
	Factor1	Factor2
仁慈的家長	0.0570	0.2660
無條件服從	0.2486	0.3908
為群體犧牲	0.3523	0.2660
求取和諧	0.3227	0.0943
為家庭犧牲	0.3470	0.1357
順服長輩	0.0904	0.2887
KMO Value:	0.6439	
chi2:	815.70	
Prob>chi2	0.000	

表 4.5: 因素分析：儒家價值

因此我們在接下來的部份，將測試不同自變數對於個人社會福利需求的效果。首先是在一般化理論模型中所提及的傳統經濟與社會變項，其次為本文所強調的儒家價值變項，最後則將納入所有自變數，觀察加入不同自變數後是否對迴歸係數產生影響。本文將先以交叉表與皮爾森卡方檢定（Pearson's chi-squared test）呈現各自變數與福利需求的關係，其次再以邏輯斯回歸模型（logistic regression）進行檢定，以勝算比呈現各變數對福利需求的影響。

### 4.3 單變數關係

承前幾章的文獻回顧，我們知道社會福利有其重分配的特質，故在西方世界的研究資料中，個人的經濟能力一直是解釋福利需求的重要因素，當我們觀察中國的資料時，也發現了相同的情形。在我們的研究資料中，其實多數民眾對國家



介入民眾生活並無興趣，而當我們將收入水平區分為低、中、高三層級時，發現中高收入水平者的偏好型態也是如此，而低收入水平者則有較多人選擇國家應當照顧民眾生活，卡方檢定也達到顯著 ( $P<0.05$ ) (見表 4.5)。而另一個經濟變項：對未來家庭經濟的展望，也呈現了類似的情形。對未來經濟前景悲觀者，也有較高的比例選擇國家福利，在此，卡方檢定的結果也是顯著的 ( $P<0.05$ )。然而我們也必須注意到，在經濟快速發展的中國，多數民眾對於自身的經濟展望其實是持樂觀態度，在我們的 3446 個樣本中，僅 122 人對未來家庭經濟是持悲觀態度，其中 16 人表示非常悲觀，不同組別間數量的差異，也使我們必須小心解讀卡方檢定的結果。

在教育程度的影響上，則我們發現隨著教育程度越高，選擇國家福利的比例也越大。在此卡方檢定的結果也是達到顯著 ( $P<0.01$ )。

在性別的方面，則顯示男性其實更企求福利，女性反而有較高的比例選擇國家不該介入社會生活，卡方統計的結果也達顯著 ( $P<0.01$ )。在經濟高速成長之下，城鄉之間所得日益增大的中國，我們卻發現農村民眾反而比城市民眾對國家提供社會福利不感興趣。這兩個因素的影響力不同於與我們先前的預期與過往的研究結果，我們將在下一章進行更細緻的討論。

藉由交叉列表與卡方檢定的分析，我們釐清了個別變數與福利需求之間的關係，在接下來的部分，我們將納入本文強調的「儒家價值」因素，並更進一步，以邏輯斯回歸模型探究各因素與福利需求間的因果關係與影響程度。

#### 4.4 福利需求的邏輯斯迴歸分析

承繼卡方檢定的結果，我們除單一控制變數對福利需求的影響外，更想知道在控制多重變數下，一般化理論中的理性經濟變數與儒家文化價值對中國民眾福利需求的影響關係為何。而由於我們將福利需求處理為只有兩個可能結果的變項<sup>1</sup>，故我們在此以邏輯斯回歸模型探討依變項與多個自變項之間的關係。其結果顯示於表 4.6。

模型 1 顯示個人收入與福利需求呈負向關係 ( $Z=-2.33$ )，即收入越高者，對

---

<sup>1</sup>支持者為 1，不支持者為 0



	<b>Welfare Demand</b>		
	<b>0</b> Col %	<b>1</b> Col %	<b>Total</b> Col %
<b>Income</b>			
0	23.2	27.8	24.6
1	43.5	40.9	42.7
2	33.3	31.3	32.7
<b>Total</b>	100.0	100.0	100.0
Pearson chi2(2) =	7.9702	Pr =	0.019
<b>Bad Expectation of Future Economy</b>			
-2	22.8	18.5	21.5
-1	47.9	50.9	48.8
0	26.2	25.9	26.1
1	2.7	3.9	3.1
2	0.4	0.7	0.5
<b>Total</b>	100.0	100.0	100.0
Pearson chi2(4) =	11.9076	Pr =	0.018
<b>Education Level</b>			
0	42.36	36.74	40.72
1	48.65	49.65	48.94
2	8.99	13.60	10.33
<b>Total</b>	100.0	100.0	100.0
Pearson chi2(8) =	20.4012	Pr =	0.000
<b>Gender</b>			
0	50.4	57.5	52.5
1	49.6	42.5	47.5
<b>Total</b>	100.0	100.0	100.0
Pearson chi2(1) =	14.5294	Pr =	0.000
<b>Rural/Urban Resident</b>			
0	44.2	50.9	46.1
1	55.8	49.1	53.9
<b>Total</b>	100.0	100.0	100.0
Pearson chi2(1) =	13.1536	Pr =	0.000
<b>N</b>	2,443	1,003	3,446

表 4.6: 卡方統計結果

福利的需求也越低。將統計值轉化為勝算比解釋，則收入每增加 1 單位，個人選擇國家介入的勝算成為原先的 0.88 倍<sup>2</sup>自模型 2 開始，我們加入其他社經控制變項。模型 2 顯示在加入社會經濟控制變項後，所得的效果反而得到加強，此發現均符合前幾章所提及的經濟自利假設，即所得越高者，福利需求則越低。此外，模型 2 的結果也顯示了在性別因素上，女性相較於男性有較低的福利需求，而教育程度的上升，則使個人福利需求增加。年齡與福利需求之間的關係在我們的模型中並不顯著<sup>3</sup>，而在所有模型之中，對家庭未來經濟展望越悲觀者，則如預期一般有較高的福利需求，且此變數亦達到顯著。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城市與鄉村住民的比較上，則城市住民更企求國家的介入。在中國城市與鄉村地區發展與所得水準差異甚大的今日，此現象特別吸引我們的注意。其原因可以有兩點討論，一是在城市，政府與黨在一般生活的介入中更為明顯，相較於鄉村居民，城市住民對政府所能扮演的角色有更多的想像空間。此外，中國經濟自由化的起點是起自於鄉村地區的「鄉鎮企業」(Huang, 2010)，因此相對於城市居民，鄉村地區民眾也許有更多經濟自由主義的觀點，而使鄉村居民較不企求國家對經濟的介入。對該部份的解釋，我們將在後續的章節中有更為深入的討論。

除了傳統的經濟變項與社會學變項外，我們在此也見到主觀「反全球化意識」對福利需求的效果。在模型 2 中，反全球化價值呈現了與福利需求的強正向關係。這也是首次有研究分析主觀反全球化態度與福利需求之間的關係，而其結果也與過往研究假設相符，對全球化越反感者，對於國家福利的需求也越高。

而自模型 3 起，我們開始檢證儒家價值的效果。首先，我們從模型 3 中可以見到，總和儒家價值變項 (confucious) 對福利需求顯現出顯著的正向影響力 ( $Z=3.24$ )，換算為勝算比，則亦即儒家價值每增加 1 單位，則個人選擇國家介入的勝算將增加 1.74 倍，其影響效果為正向。這符合我們前述的假設，即儒家價值將加強個人的福利需求，而與之前文獻中一般認為儒家價值與福利擴張並不相容的看法相悖：當然在此我們必須更清楚地說明，這意味著在個體層次上，具備儒家價值的個人反而更認同國家介入經濟社會，而非追求最小國家，而非總體層次

<sup>2</sup>在此以「勝算」(odds) 解讀 logistic regression 的結果；勝算即為某事件發生的機率與未發生的機率比值。

<sup>3</sup>值得注意的是，若我們將連續性的年齡變數編碼為二分的「世代」變數，則無論以 1970 或 1980 (即所謂的「80 後」) 為斷點，也均對福利需求無顯著影響力。

的解讀。此外由模型 4 中我們也發現，在加入模型 1 至 3 中所得等控制變項後，儒家價值的影響仍舊維持顯著，而教育與經濟等其他變項的效果亦未受影響。顯示儒家價值這源遠流長的文化因素，對中國民眾福利需求的影響力十分穩健，且在此同時，中國人也符合西方理性自利的假設，所得等經濟變項依舊影響了民眾對福利的需求。

而在模型 5 到 8 中（見表 4.7 與 4.8），我們將儒家價值再區分為三構面，即家父長價值、社群主義價值與家庭主義價值三者，並檢視各構面對福利需求的影響力，而圖 4.2, 4.3 與 4.4 則為各變數係數轉換為勝算比的圖像化<sup>4</sup>。首先我們將三個不同的構面依序加入模型中，從模型 5 到 7，我們發現其他自變數的影響結果不受儒家價值的加入而改變，而三構面也展現出不同的影響力。家父長價值與家庭主義價值的影響力與符合我們先前的假設，展現出正向的影響。換算為勝算比，則家父長價值每增加一分，選擇福利的勝算便增加 1.18 倍，家庭主義價值的增加則將提昇福利需求的勝算為 1.27 倍，且均達到統計顯著（ $P < 0.05$ ）。相較之下，社群主義則未能達到統計顯著，且在該模型中，社群主義也未展現出其影響的正負向趨勢。

模型 8 則是我們的總模型，將儒家價值三構面與其他自變數一同加入分析，而圖 4.5 亦為模型 8 中各變數係數轉換為勝算比的圖像化。結果顯示收入、教育程度與性別變項的影響依舊顯著，且影響方向相同，而新加入的儒家價值三構面則分別有不同的影響力。首先，家父長主義與家庭主義兩者同模型 5 到 7 的分析結果，均對福利需求有正向影響，這也符合我們先前的假設，帶有「善政」看法的個人，將認為政府在個人生活中將扮演更為吃重的角色，能照顧到人民食衣住行的政府才是其心目中理想的政府。其次，家庭主義價值越高的個人，由於國家介入經濟生活將能減低其個人在照顧角色上的重任，在日趨工業化的社會填補過往需大量家族人力物力投入的照顧機制，因此也更希望政府能更多地介入經濟生活。然而，在模型 8 中，社群主義依舊未能達到顯著影響力，甚至在影響趨勢上轉而呈現負向，此結果更值得我們在後續的篇幅中進行討論。

為了確保模型 8 的結果並未受到儒家價值變數之中的共線性所影響，我們也進行了儒家價值變數之間的共線性檢定。然而從 VIF 值中我們發現，三變數的平

<sup>4</sup>\* 圓點為勝算比之點估計值，兩側紅線為其 95% 信賴區間；當紅線區域未包含 1 時，則表示該變數影響力達統計上顯著（ $p < 0.05$ ）。



均 VIF 值僅為 1.07，顯示三變數之間並無共線性關係。


而藉由統計分析的結果，我們可以預測中國社會「平均個人」選擇國家擔負民眾生活責任的機率，以及擁有較高儒家價值或低儒家價值者，其選擇福利國家的機率又有多少（見表 4.9）。首先我們先計算「平均個人」，即各變數均為樣本平均數的個人，選擇福利國家的機率，為 0.285。這表示當一個中國民眾，其各自變數均為自變數平均數時，該個人會有 28.5% 的機率會選擇福利國家。相較之下，儒家價值最高者（即家父長主義價值、社群主義價值及家庭主義價值均為 2，其他自變數均為平均數者），其選擇福利國家的機率將上升到 34.8%，而保持其他自變數為平均值，若一個人儒家價值分數為零者，則其選擇福利國家的機率將下降至 22.8%。依此我們可以發現，儒家價值對個人選擇國家介入個人生活好壞與否，其實有一定的影響力。在僅有 29% 的個人選擇福利國家的中國，儒家價值保有者選擇福利國家的機率將提昇 20% 之多。

個體類別	預測機率 (Demand = 1)
平均個人	0.285
儒家價值高者	0.348
儒家價值低者	0.228

表 4.7: 個體預測機率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們的所建構的每個邏輯斯迴歸模型中，其 pseudo R square 值都不是太大。即使是在總模型之中，其值也僅有 0.0238，這也顯示除了我們所提出的自變項外，應該還有更多其他的因素得以解釋中國民眾的福利需求。

總結上述結果，我們發現在對中國民眾的分析中，既有的理性自利模型並未失效，收入與對家庭經濟的展望仍能很好地預測個人的福利需求，而教育與性別等因素也有其影響力。而在經濟自利與諸多控制變項之外，文化因素，特別是儒家價值中的核心概念，如家父長主義與家庭主義等，也展現了對一般民眾福利需求的影響。與過往看法不同的是，這些儒家價值並不與福利需求相悖，反而更促使人們要求國家對經濟社會的介入，而非新自由主義下的最小國家。而在以下的篇幅中，本文將更進一步以多層次邏輯斯迴歸分析



	(1)	(2)	(3)	(4)
	demand	demand	demand	demand
demand				
income	-0.119* (-2.38)	-0.177** (-3.26)		-0.176** (-3.25)
edu_c		0.279*** (4.07)		0.299*** (4.33)
age		-0.0000257 (-0.01)		-0.00123 (-0.43)
female		-0.325*** (-4.13)		-0.316*** (-4.01)
worsefuture		0.120* (2.39)		0.139** (2.74)
rural		-0.229** (-2.83)		-0.256** (-3.14)
anti_glob_c		0.184*** (4.22)		0.158*** (3.56)
confucious_sum			0.0929*** (3.29)	0.0998** (3.24)
_cons	-0.750*** (-11.56)	-0.683*** (-3.56)	-1.250*** (-10.65)	-0.986*** (-4.61)
pseudo R <sup>2</sup>	0.0014	0.019	0.0026	0.0217
N	3388	3350	3473	3350

*t* 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  
 \*  $p < 0.05$ , \*\*  $p < 0.01$ , \*\*\*  $p < 0.001$

表 4.8: 邏輯斯回歸模型 1-4



	(1)	(2)	(3)
	demand	demand	demand
demand			
income	-0.172** (-3.18)	-0.177** (-3.27)	-0.178** (-3.28)
edu_c	0.303*** (4.38)	0.279*** (4.06)	0.297*** (4.30)
age	-0.000768 (-0.27)	-0.0000356 (-0.01)	-0.000921 (-0.32)
female	-0.317*** (-4.02)	-0.324*** (-4.12)	-0.322*** (-4.08)
worsefuture	0.133** (2.64)	0.120* (2.39)	0.126* (2.50)
rural	-0.249** (-3.07)	-0.229** (-2.83)	-0.242** (-2.99)
anti_glob_c	0.167*** (3.80)	0.183*** (4.18)	0.166*** (3.77)
parental	0.159** (2.93)		
commu		0.00289 (0.04)	
fami			0.226*** (3.41)
_cons	-0.810*** (-4.11)	-0.686*** (-3.31)	-0.912*** (-4.48)
pseudo R <sup>2</sup>	0.0212	0.0191	0.0220
N	3350	3350	3350

*t* 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

\*  $p < 0.05$ , \*\*  $p < 0.01$ , \*\*\*  $p < 0.001$

表 4.9: 邏輯斯回歸模型 5-7

## 4.5 福利需求的多層次邏輯斯迴歸分析

在本段中我們將納入個人的居住地點，並以居住地作為第二層分析單位，進行多層次邏輯斯回歸。首先我們以空模型（null model）評估省層級的影響力<sup>5</sup>，並利用 LR-test 的結果加以驗證。由於其統計量為 101.58，p-value 也低於 0.000，因此證實各省居民福利需求的變異量並非為零，故使用多層次的分析方法有其必要。

接著我們將研究變數加入多層次模型中，此時我們所套用的模型為多層次隨

<sup>5</sup>我們所利用的分析軟體為 Stata 12 版，計算多層次回歸的方式為最大可能性估測法（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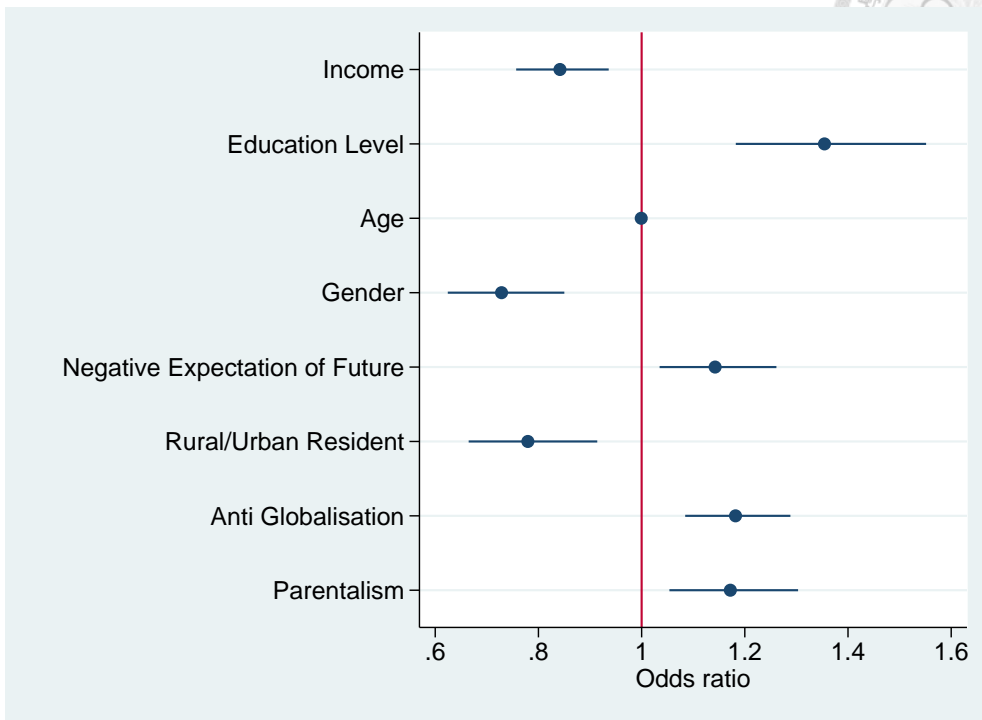


圖 4.3: 自變數與控制變數勝算比 - 模型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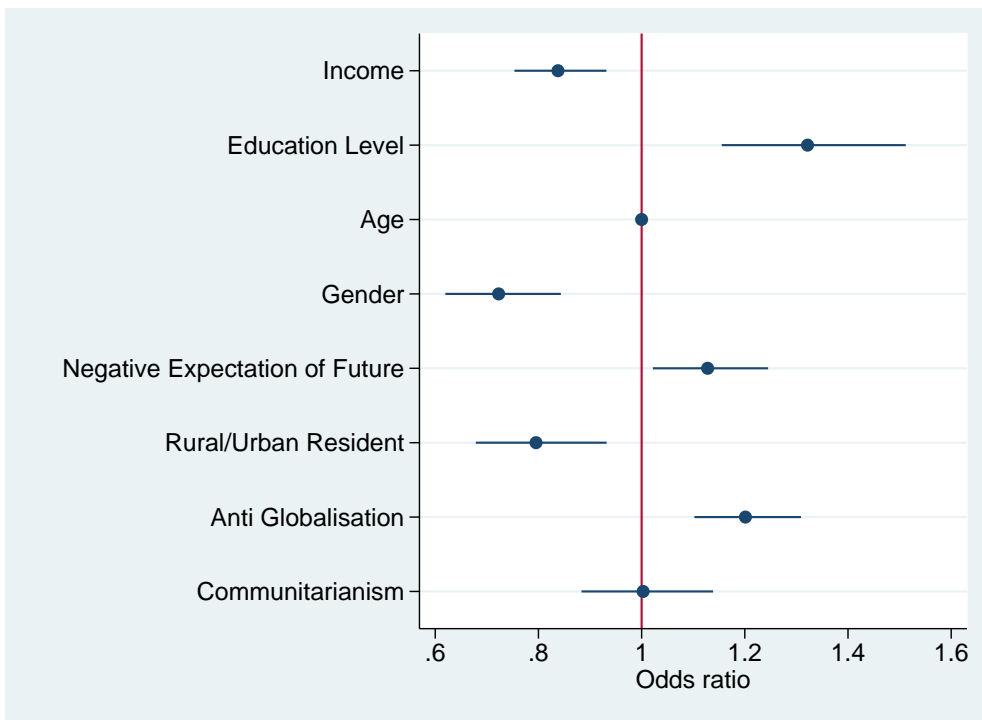


圖 4.4: 自變數與控制變數勝算比 - 模型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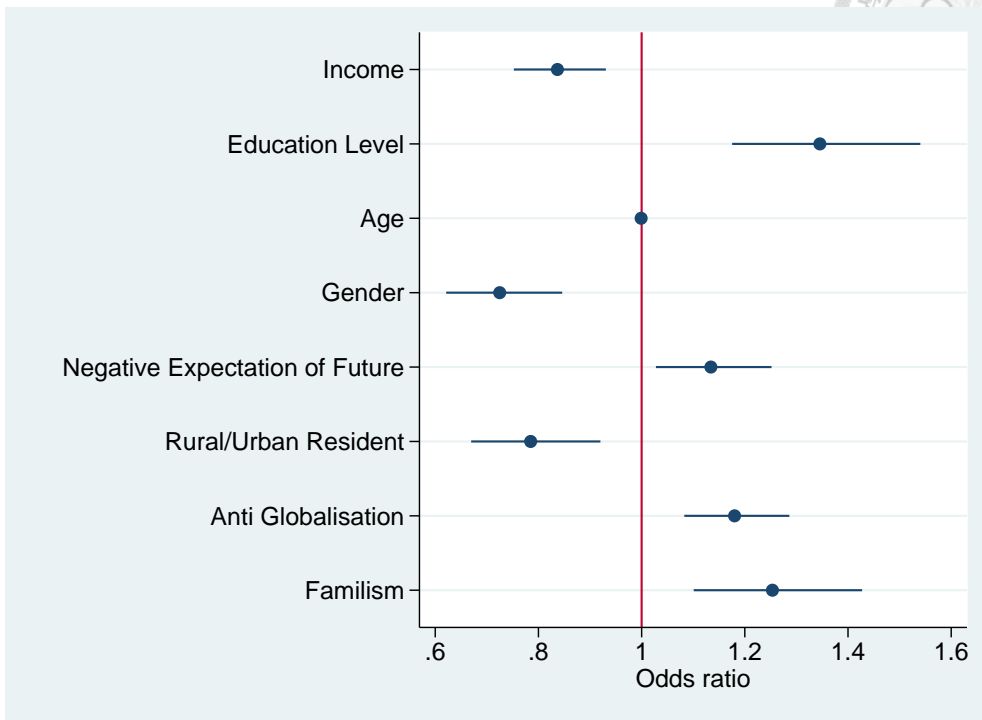


圖 4.5: 自變數與控制變數勝算比 - 模型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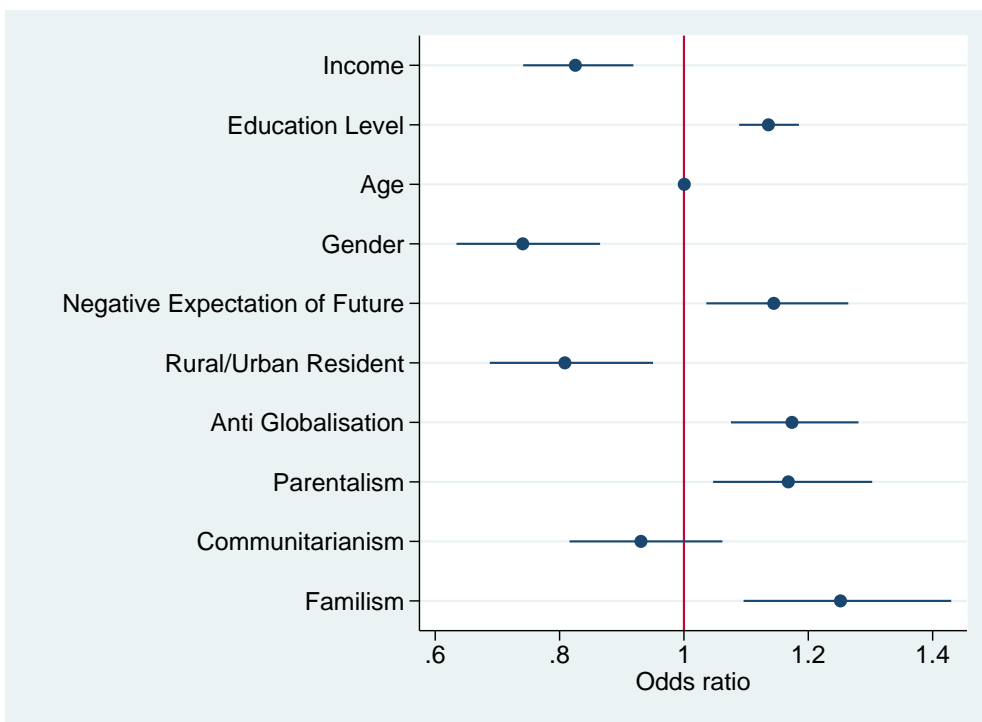


圖 4.6: 自變數與控制變數勝算比 - 模型 8



	(1) demand
demand	
income	-0.173** (-3.17)
edu_c	0.321*** (4.60)
age	-0.00133 (-0.47)
female	-0.317*** (-4.02)
worsefuture	0.132** (2.61)
rural	-0.255** (-3.13)
anti_glob_c	0.157*** (3.53)
parental	0.147** (2.64)
commu	-0.0696 (-1.04)
fami	0.215** (3.18)
_cons	-0.934*** (-4.32)
pseudo R <sup>2</sup>	0.0238
N	3350

*t* 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  
 \*  $p < 0.05$ , \*\*  $p < 0.01$ , \*\*\*  $p < 0.001$

表 4.10: 邏輯斯回歸模型 8

機截距模型 (random-intercept model)，其中  $x_1, x_2, \dots$  為我們的研究自變數，另外截距  $u$  則將隨著不同的省則有所不同：

$$\log\left(\frac{\pi_{ij}}{1 - \pi_{ij}}\right) = \beta_0 + \beta_1 x_{1ij} + \beta_2 x_{2ij} + \dots + u_{0j}$$

以下的表 4.10 與圖 4.6 至 4.7 即為多層次分析的結果。我們可以發現其結果與前文中未進行多層次分析的結果幾近相同，此外，其 LR-test 的統計量也與空模型相去不大，故我們也可以研判，我們在模型中所納入的如收入、教育程度等自變數以及儒家價值變數的影響力，並不隨著不同的省籍改變。因此可以說，儒家價值對福利需求的影響力是全國性的，而不局限於特定省市或地區。





	(1) demand	(2) demand
eq1		
income	-0.216*** (-3.80)	-0.212*** (-3.72)
edu	0.108*** (4.78)	0.115*** (5.04)
age	-0.000908 (-0.30)	-0.000974 (-0.32)
female	-0.277** (-3.26)	-0.277** (-3.25)
worsefuture	0.147** (2.81)	0.144** (2.75)
rural	-0.259** (-2.85)	-0.262** (-2.87)
anti_glob_c	0.153*** (3.32)	0.153*** (3.32)
confucious_sum	0.109*** (3.41)	
parental		0.199*** (3.45)
commu		-0.0664 (-0.96)
fami		0.170* (2.44)
_cons	-1.117*** (-4.36)	-1.038*** (-4.01)
lns1_1_1		
_cons	-0.728*** (-4.01)	-0.730*** (-4.02)
<i>N</i>	3350	3350

*t* 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  
 \*  $p < 0.05$ , \*\*  $p < 0.01$ , \*\*\*  $p < 0.001$

表 4.11: 多層次邏輯斯回歸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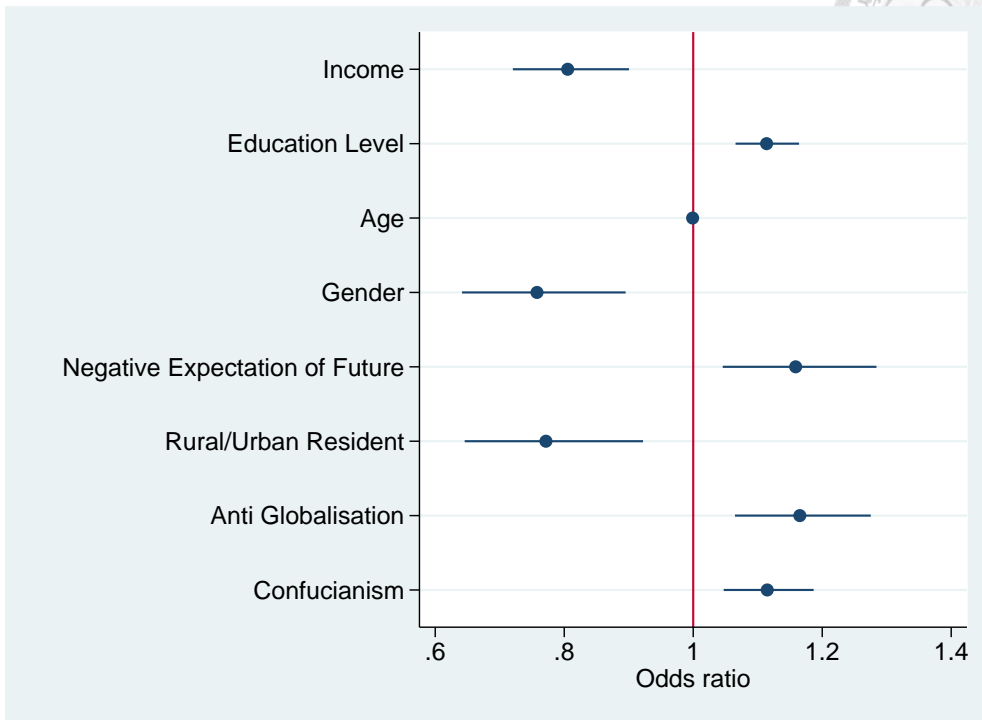


圖 4.7: 自變數與控制變數勝算比 - 多層次模型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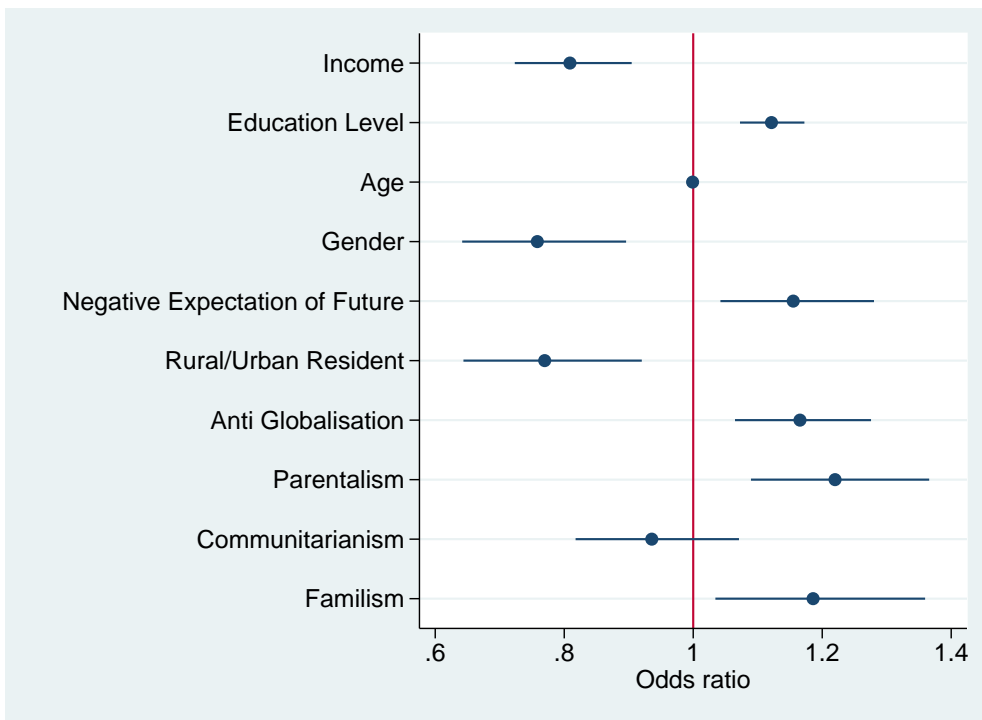


圖 4.8: 自變數與控制變數勝算比 - 多層次模型 2



## 第五章 結果與討論



在先前的章節中，我們對中國民眾的福利需求進行了統計分析，在以下的篇幅中，我們將基於前章的分析結果，對照本文的研究假設及既有理論，對影響民眾福利需求的因素進行解讀，並以中國民眾為分析對象，對既有以理性自利個人為基礎的福利需求理論模型提出新觀點。從理性選擇理論出發，我們可以預期個人的經濟稟賦將是影響福利需求的最重要因素，然而我們的研究更進一步納入了「文化」層次的解釋觀點，另外在統計分析時，也將非經濟的個人因素納入了分析。因此，在此我們也將影響中國民眾福利需求的因素區分為三者：經濟因素、非經濟因素與文化價值三者來進行討論。

### 5.1 經濟與非經濟因素

根據前一章統計分析的結果，我們也確實發現，在經濟因素上，一如分配模型的推論，可利用的收入與對家庭經濟的展望的確對福利需求有明顯的影響。這顯示了無論東西方，經濟仍舊是影響人們對社會福利看法的主要因素，本文僅是再次確認該理論的效果與在中國的適用性 (Meltzer and Richard, 1981)。而在改革開放之後，中國的經濟社會逐漸往西方的資本主義社會形式靠攏，在經濟稟賦決定。然而，在經濟因素之外，影響中國民眾福利需求的因素則顯現出了與西方諸國不同的模式，也是值得我們多加著墨之處。

首先是教育。在教育程度的影響上，過去的研究認為教育程度與經濟能力的高度相關，使教育程度的高低較近似於經濟能力的代理因素 (proxy)，且教育程度的提升也將提升個人在社會流動上的機遇，使其對個人財富的展望有更高的預期，因此教育程度較高者對福利的需求也就愈低。然而，我們對中國的研究卻顯現出相反的結果，高中畢業以上者，對於福利需求的比例也越高。關於教育程度的影響，我們自美國的調查資料中發現，教育程度對福利需求的影響還受到個人意識型態的左右，教育程度的提升將加強意識型態的效果，使右者越右，左者越左 (Alesina and Giuliano, 2011)。而在曾是共產國家，尊馬克思為思想正宗的中國，我們雖無法在資料中以個人偏好的黨派區別其左右傾向，但也許可以想像，個人

的「左派意識」也與教育程度有正相關<sup>1</sup>，因此個人在教育體系中停留的時間越長，受左派思想的灌輸也越多，而教育程度又加強了其意識型態的效果，而造成中國高教育水平者的高福利需求。

在性別的部份我們也發現，中國的女性與男性相比，對社會福利的需求較低。在美國，女性其實是比較偏向左翼，也較為支持社會福利的 (Alesina and Giuliano, 2011)。此外，在傳統的觀點上，我們似乎也傾向將女性想像為更富同情心，更關懷家庭以及弱勢的一方，故我們時常假定女性應當較為偏好福利供給。但中國女性福利需求較低的狀態，其實有跡可循，且範例不在別處，而就在西方世界。事實上，二次大戰之後至 1980 年代之間，「女性保守主義」(women conservatism) 其實是較為普遍的觀點，也存在於美國以女性為主的保守派草根團體 (Nickerson, 2012)。美國的這個現象在 1980-90 年代出現轉向，婦女的投票行為才逐漸偏向左翼，而若與同時期世界各國做對比，則可以發現隨著國家經濟的發展，當國家步入後工業化，後現代主義思潮與女性運動逐漸出現後，女性的投票傾向將較偏向左派，而後共產與發展中國家的女性則更偏右一些，可以說是「性別差異的發展型理論」(Gender gap developmental theory) (Inglehart and Norris, 2000)。而中國，正是世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雖然我們無法衡量中國民眾的左右態度，但其女性的低福利需求其實並非特例。此外，我們也得以將女性與接下來要提的鄉村/城市居民的差異作類比。

在我們的分析結果中，更特殊的地方在城鄉之間的對比。根據分配模型，距離收入中位數愈遠的個人，將更支持社會開支，而中國經濟不平等的最大來源便來自城鄉之間 (Sicular et al., 2013; Xie and Zhou, 2014)，城市居民與鄉村居民的收入自 1985 年的兩倍逐步攀升到 2012 年的三倍 (見圖 5.1)。因此，依照分配模型的邏輯，經濟弱勢的鄉村居民應較城市居民更支持社會福利。

但分析的結果卻出乎意料，鄉村居民顯然更拒斥政府對個人生活的介入。針對此結果，我們可以從改革開放過程中，農村與城市經濟發展的消長來討論。但首先，我們可以先回顧既有文獻的發現。

無獨有偶地，經濟弱勢者反而對政府介入經濟生活的反感現象也見諸於先前

<sup>1</sup>我們在此要特別釐清中國人與西方對於「左右派」之間的看法。在這裡所提及的「左派意識」並非中國國內的觀點，認為左派即為回歸共產主義計畫經濟與文革時代的主張，而是西方對左派的定義，例如對社會分配的重視，或對國有化的偏好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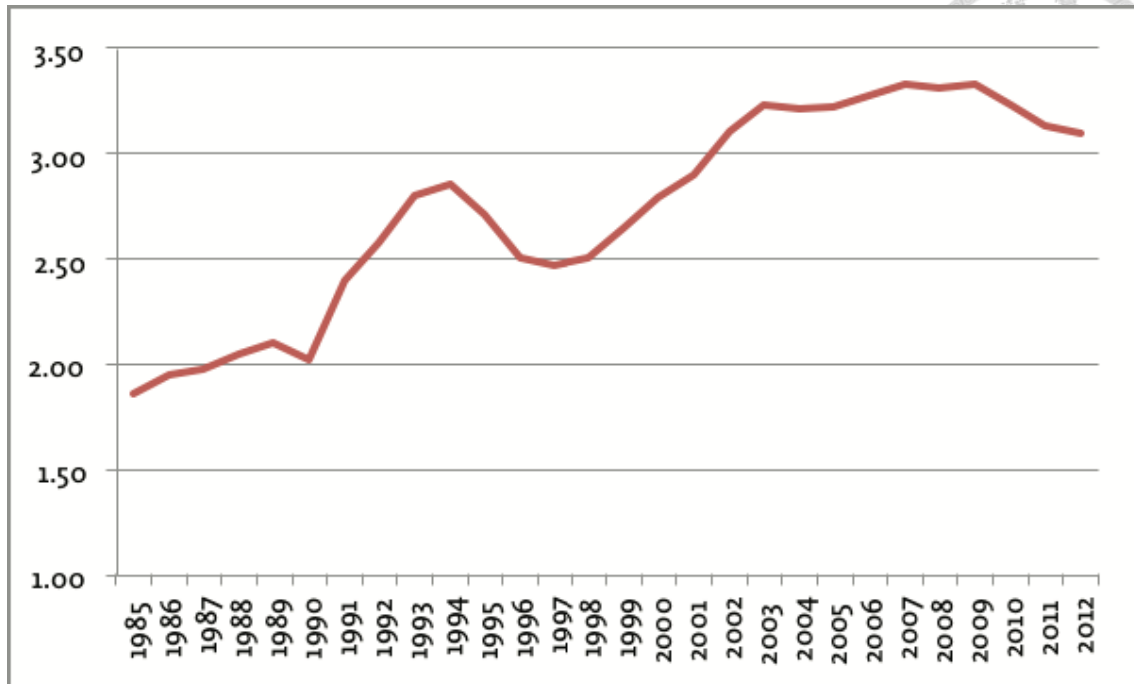


圖 5.1: 中國城鄉居民收入比：1985-2012（轉載自 Inequality in focus 2 (2) , 2013）

的調查資料：Martin King Whyte 於 2004 年進行的全國性調查中，也發現有兩類人對於政府介入經濟生活，以調控不平等狀態持負面意見，即「客觀條件不利者」與「主觀條件有利者」題 (Whyte, 2010)。後者即我們在經濟變項中見到的個人經濟預期，<sup>2</sup>而「客觀條件不利者」，在 Whyte 的定義中，則為農村居民與女性。這也正如我們的發現。

Whyte 對該現象的解釋則可以與我們的觀點相互參照：他認為「政府介入調節貧富不均」並非完全的齊頭式平等，因而對高社會階層者並無實際威脅，此外，在政府政策中受益或與政府組織關係較密切連結的群體，會較相信且同意政府改善貧富差距的措施。相反地，在政策中受害或與政府組織較無關係者，即便自身更偏好社會公平，但對於政府的政策則持抗拒的態度。以此邏輯，我們是否能找出鄉村居民在中國經濟政策的變化過程中受害的案例？

我們可以以實際案例來更深刻解讀這兩個因素。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的經濟模式並非如當下以國營企業及以城市經濟為主，反之，經濟成長的來源主要來自以鄉村為基地的鄉鎮企業 (township and village enterprises, TVEs)，鄉鎮企業雖名為公私合資，但多以個人或家戶經營為主，而使鄉村經濟型態由過去效率低下的

<sup>2</sup>由於我們在模型中使用的收入水平，亦為個人對自身所得是否夠用的評估，因此可以說我們的經濟變項也全是在評估個人的「主觀條件」。

Per Capita Household Income and GDP Growth During Three Policy Periods (1978 prices,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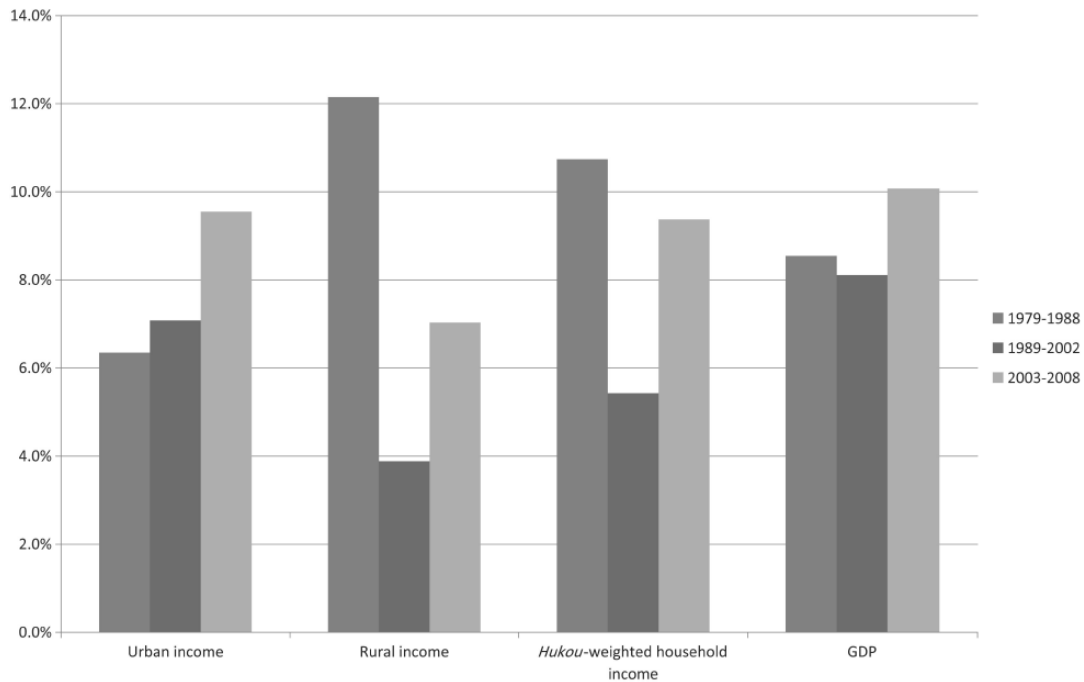


圖 5.2: 城鄉居民收入成長率的消長：1979-2008（轉載自 Huang, 2010）

農村公社轉化為高效率、高附加價值的私有手工企業。同時，農業合作社組織的建立，使提供給新創企業的小額貸款成為可能，而使農村地區迅速達到金融自由化，也提供了鄉鎮企業的資金流動性。該自由化措施非常成功，也是致使中國能在 1980 年代迅速脫貧的主因 (Huang, 2010)。

然而這些主要施行於農村的自由化政策，在 1990 年代初期遭到反轉。農村的資金被收緊，以供城市的大規模建設使用，而中央經濟政策也轉以扶植大型國企為主，農村的私人資本迅速凋落，同時也反映在城市與農村居民的收入比上（見圖 5.2）。而隨著 90 年代後城市資本的市場化，在城市地產高速飛漲的背景中，城市與農村居民的財富比也從此一去不復返了。因此我們可以說，在改革開放的初期，農村居民是自由化政策的贏家，但 90 年代後政府政策向城市的轉變以及鄉村金融政策的緊縮，以及備受詬病的「戶口」制度，使農村居民成為改革的輸家，因此農村居民不認同政府介入經濟生活，甚至對政府的經濟或福利政策缺乏信任，也就不足為奇了。

除改革開放進程的因素外，從廣受國際關注的廣東烏坎事件開始，農村共有土地被賤賣的事實被公諸於世，同時也讓我們得以一窺農村居民與村委會之間的



緊張關係。在對烏坎事件的紀錄中可以發現，居民與村委會之間互信的程度並不高，且村委會對村內事務也並未有太多的過問。此外，中國農村幅員的規模，也使政府對農村居民的掌握，及社會福利的建設等，較城市的密度低。因此在遭遇社會事件，或有社會福利的需求時，較仰賴村里或宗族之間的協助。同樣的狀況也得以延伸到對女性的討論：改革開放雖使中國女性初嘗獨立於男性與家庭之外的經濟契機 (Rivoli, 2005)，但改革開放二十年後，男性依舊是這塊經濟大餅中絕大部分的獲取者 (Fincher, 2014)，男性也掌握了絕大多數的政府機器<sup>3</sup>，因此，女性對於公平社會的偏好也許並非不如男性，但對於政府所供給的福利政策，則採取較為保留的態度。綜合以上兩層次的觀點，中國女性與農村民眾也許並不是拒斥社會福利或是重分配，而是基於經濟改革過程中成為輸家的經驗，以及與政府機關的距離，而更偏好讓國家不介入經濟生活。

另外，我們在模型中也加入了反全球化的因素。既有的文獻指出，全球化對既有產業結構的衝擊將影響本地勞工的經濟不安全感。而經濟全球化的衝擊也影響了中國：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後，中國雖藉由廉價的工業勞動力，迅速成長為世界工廠，但農民與工人依舊必須面對市場開放的後果。我們發現，即使中國民眾對於市場經濟有很高的信任度 (Whyte, 2010)，但對於反全球化意識較高者，依舊與西方諸國的民眾一般，對於社會福利有較高的需求。相較於我們以下要敘述的儒家傳統價值以及前述的基本社會經濟變項，反全球化意識是本研究中與現代經濟現況關聯最為強烈的部份。隨著中國薪資水平的快速上升 (見圖 5.3)，基於廉價勞動力的出口工業也逐漸面臨瓶頸，在出口工業由沿海往內陸遷移、內陸往東南亞遷移之後，我們可以預期中國也將如鄰近的東亞四小龍一般遭遇到工業化的衝擊。因此，基於我們的研究結果，我們可以預期隨著薪資壓力而來的衝擊，中國民眾的福利需求也將隨受全球化與去工業化影響而水漲船高。

最後，我們要討論兩個未能在本研究模型中達到顯著的變數：年齡與關於努力是否能得到成就的看法。先從後者看起，在前述 Whyte 的研究中，我們發現中國民眾對於當下中國的自由市場經濟信任度相當高，人們對於自身的社會流動機會也充滿信心<sup>4</sup>。同時從我們的資料中也發現，有將近 75% 的中國民眾較相信「努

<sup>3</sup>反映在中國最高層領導者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男女比為 7:0。

<sup>4</sup>同樣地，這也是中國民眾仍能忍受高度貧富差距的主因。



圖 5.3: 中國人均薪資：2005-2015（資料來源：中國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製圖：<http://www.tradingeconomics.com/>）

力將得到回報」，在社會流動（至少在心理上）依舊可能，「中國夢」口號仍震天價響的此刻，該現象並非不可理解。但認為成就是天生注定者並未如歐洲民眾表現出較高的福利需求 (Alesina and Giuliano, 2011)，我們則認為與身處的政策環境有較高的關係。由於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主要採行市場化的經濟政策，是故民眾對於親市場的福利政策也習以為常，對政府介入較無想像，因此也不會有較高的福利需求 (Alesina and Angeletos, 2005)。然而，隨著中國緩步的福利轉型，以及經濟發展速度的減緩，未來民眾對於社會流動的看法以及福利需求之間關係的消長變化，仍舊值得我們持續關注。!

另外，年齡的部分並未達到顯著，也並未令我們感到意外<sup>5</sup>。由於研究依變項並非指稱與年齡較有關聯的特定福利政策，如年金或育兒補助等。因此，福利需求便不若前引文獻中年齡對福利開支的理性模型一般，隨年齡上升而下降。事實上，在歐美，隨著戰後嬰兒潮一代走入年金世代，伴以因經濟危機而水漲船高的青年失業率，與年齡相關的福利政策由於日益浮現的「世代正義」或「代間貧富差距」逐漸受到注目。然而在經濟處於成長期的中國，世代間的剝削還未成為現象，事實上，中國與歐美各國在大的不同在於「先富起來」的群體。在歐美，黃金時代指的是二次戰後二十年的持續繁榮，而中國則是 1980 年之後的二十年，故經濟成長的受益者還未到達退休年齡，因此，世代正義的問題還未影響中國。

<sup>5</sup>且我們也嘗試將年齡的平方項加入模型，但亦無顯著效果。此外，即使將年齡以「70 後」、「80 後」作成世代二分變項，也未表現出對福利需求的影響。

但基於一胎化政策所導致的快速人口老化以及扶養比的惡化，卻使中國世代正義或剝削的問題也許晚至，但規模與程度卻將有更大的影響。

然而，以上非經濟因素對福利需求的影響因果鏈，仍多未能擺脫理性自利的解讀。除教育的思想效果外，無論是性別或農村身分，在解讀上都與經濟的負面效果擺脫不了關係，然而我們更想知道的是，是否仍有一些承習已久的文化價值，將使個人更無私地思考政府與民眾之間的關係，以他人的角度出發，而選擇福利國家。

## 5.2 儒家價值的影響

以經濟學理性自利個人為出發點，福利需求理論模型告訴我們：人們對於社會福利的企求不外乎來自個人衡量自身經濟稟賦的結果。貧者選擇政府介入，富者情願政府作為守夜人，同時，職業與對未來的期許也影響了個人的觀點。然而，在直截了當的模型之下，似乎缺乏了一些什麼：若身處無知之幕之後，對未來毫無所知的個人，即使明白社會將是不平等的社會，但基於差異原則（difference principle），我們仍將選擇保護最弱勢者維持作為人類的尊嚴 (Rawls, 1971)。但這依舊是考量了個人自身利益的算計結果，然而在諸多理性自利又孤獨的個人之外，是否有僅僅是由關切他人之利出發，而企求大國家的可能？以他利（altruism）出發來思考對國家福利的需求，其實並非獨到的創見 (Taylor-Gooby, 1985)，在利益算計外，個人也可能將福利體系視為是整個社會共有的道德承諾。以性善論出發，孟子認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因而展開「仁政」與「王道」的論述，倘若真是「惻隱之心，人皆有之」，那麼這種價值信念又將對福利需求產生多大的影響力？

從上一個段落我們了解，除經濟因素外，仍有許多非經濟因素將影響對社會福利的需求。而除了性別、年齡與教育等基本變項外，我們更關切的是在中國，文化的因素是否也在影響福利需求上扮演了特殊的角色。相較於西方以自利為基礎的個人主義，中國在儒家傳統上的確對「利他」（altruism）的看法有所不同。其並非基於互惠利他主義（reciprocal altruism）<sup>6</sup>，而更是「同理心」的展現。作為唯一一傳統文化延續至今的文明古國，儒家價值是如何與現代國家連結起來？自文化大革命以來，儒家傳統是否還存續於中國社會，其實一直是受到廣泛討論的課

<sup>6</sup>即並非因能得到利益而決定利他與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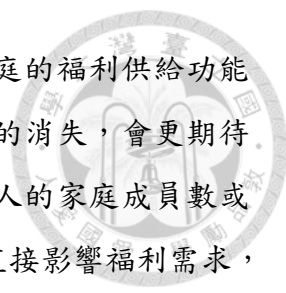
題。而藉由民意調查與統計技術，我們得以將儒家價值與福利國家需求連繫起來，並評估儒家文化不同的構面對福利需求的影響。

我們延續了 Shin 對儒家價值的三構面的定義，將儒家價值區分為家父長主義、社群主義與家庭主義三者。而進入統計分析，我們發現除了總和儒家價值將正向影響福利需求外，還發現在儒家價值之中，家父長主義與家庭主義對福利需求有最大的影響。該結果反駁了過去學者對於儒家價值與社會福利無法兼容的觀點，或者說，至少在基層民眾的個體層次上，儒家價值較高的個人將更贊同社會福利。我們以下逐一討論各構面的影響及其理論意義。

我們利用兩道題目來捕捉家父長價值，而該價值對福利需求的正向效果證實，若民眾對國家領導者的信任一如對家長或父母的信任，那麼他們也將認為政府將擔負起民眾生活好壞的責任。其實也就如同我們對於父母的信任，相信父母不會置我們於不顧一般，家父長制善政的內涵也反映了民眾對政府的依賴，相信領導者不會視民如草芥，而該善政的目標便是人人生活水平均受政府保護的社會。有別於西方以自利為出發點的假說，該觀點並非理性算計的結果，而更近似於原生的信仰或價值，將自身成長時期對父母的依賴投射於政府領導者。該因素在歐美文化中似乎很難被想像，在西方，社會福利的興起主要是為應對資本主義興起後人力的商品化現象，但家父長制善政的概念卻根源自更古老的，以手工交換為主體的時代，似乎與現代的社會福利觀點格格不入。但事實上，東西方對於政府的想像也許本有不同，西方語境中的”State”與家庭毫無關聯，但在華語語境中，我們稱之為「國家」。「國」與「家」密不可分的聯結，便隱含了東亞民眾將家庭情感投射於國家的觀點，因此，在遭遇現代資本主義經濟與社會問題出現的同時，而國家力量又成長到足以提供社會服務時，一如人於成長過程中遭遇困難時一般，家父長價值較高者便將求助於國家，而非市場力量。

若家父長價值與福利需求的關聯性較為直接，那麼，家庭主義與福利需求之間的因果鏈便需要我們加以解讀。在過往的文獻中，儒家價值中的家庭主義是執政者得以將福利供給侷限於家庭中，而減少福利開支的藉口，然而下降到一般民眾的個體層次上，結果顯然並非如此。針對該現象，我們可以從兩方向進行討論。

首先是我們在研究假設中所提及的，隨著社會現代化以及強制一胎化政策而



導致的少子女化及高齡化現象，伴隨女性勞動力的解放，使家庭的福利供給功能大受破壞。而對於家庭較重視者，為了彌補家庭既有福利功能的消失，會更期待政府的福利政策來加以填補。而由於我們並未在模型中控制個人的家庭成員數或子女數，因此我們的模型顯示了主觀意識中的家庭主義價值將直接影響福利需求，而不僅僅是調節經濟自利因素的交互作用項 (Mehlkop and Neumann, 2012)。另外，家庭成員數或子女數也許將決定一人的家庭主義價值高低，但由於使用資料的限制，我們的模型並未能檢證家庭規模是否影響家庭主義的效果，故僅能說明家庭主義在個人層次上對福利需求的正向關係。


此外，我們也可將結果看成是家庭主義價值越高者，並未如「家戶式福利國家」的假設一般，將福利供給視為是自己的責任。根據我們的分析，相反地，家庭主義較高者將更支持政府介入，因此，政府或執政者在進行政治宣傳時對於家庭主義的推波助瀾，並無法降低民眾對於政府福利開支的需求。

最後，在儒家價值之中，我們發現「社群主義」價值不僅未能顯著影響福利需求，在影響的趨勢上甚至呈現負向效果。而其原因，我們認為是選用題目的限制以及中國民眾對「群體」的認知所造成。在選用題目的部分，我們在模型中用以捕捉社群主義的是「為群體犧牲」及「求取和諧」兩道題目，而這兩道題目並未能很好捕捉到儒家價值社群主義的「同理心因素」。在「為群體犧牲」的題目中，我們並未界定所指涉的「群體」為何，雖在亞洲民主動態調查核心問卷中，有詢問個人主要參加社會團體的題組，但可惜的是，我們並未在中國詢問該問題<sup>7</sup>，且願為群體犧牲者，也將更有可能為捍衛自身所處群體的利益而犧牲非我群者的利益，這顯然並非我們所希望捕捉的「憐憫之心」，此外，華人社會中最重要的群體一直是排他性極高的家庭與宗族，是故我們也不能排除對所在群體愈在乎者，會表現出愈高的排他性。其次，「求取和諧」的問題更多是表達個人「不願衝突，保留表面和平」的面向，反映的是應對衝突時採取的行動。但和諧並不表示衝突被消滅，也並非我們所欲捕捉的「利他」效果。

而這種高侷限性的同理心，即顯出了另一個我們仍未提出的儒家價值重要面向，即費孝通所提出的「差序格局」概念。傳統中國形成群體的遠近親疏由個人血緣為核心，依序外推，並形成一個又一個以自身為主的同心圓。這種社會連結

---

<sup>7</sup>由於各國國情不同以及政治敏感的關係，即使為「核心」題組，仍有未能詢問的部份。



的形式與西方（甚至與東洋）傳統的不同，使得傳統儒家主義對於公/私之間的劃分十分曖昧。此外，在費孝通文中也提及，該差序格局也影響了中國民眾對「國家」的想像，國家並未成為超越一切以己為中心小團體的存在，這也使得在我們論及「以全體國民為主體」的社會福利時，儒家價值中的「社群主義」影響方向將不同於西方學者言中的「社群主義」，在區隔了我群與其他國民的同時，自然也降低了對於全括式福利供給的需求。

承上所述，儒家價值一如我們在前幾章做出的假設，對中國民眾的福利需求展現出正向的影響。然而，當我們解析儒家價值三構面時，我們發現其影響的效果並非盡如我們的預想。家父長價值反應了東方民眾國與家心理上密不可分的關係；家庭主義則使福利供給的機制由家庭外溢至政府層次，而社群主義對福利需求的影響雖為負向，但並未達到統計顯著。同時，我們也未能證實「他利」或是「惻隱之心」在福利需求上的影響，但卻足以證實在中國，「文化價值」確實是影響個人福利需求不可被忽視的因素之一。

2012年以來，中國進入習近平時代。而其所提出的「中國夢」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中對傳統文化的重新強調，使得儒家價值對社會的影響力重新受到重視。因此，展望未來，本文的發現也預示了中國政府對於儒家價值的重新重視，將可能不若統治者的期待一般再次成為壓抑福利需求的思想武器，而將使民眾更容易想像福利國家的樣貌。

### 5.3 小結

我們在本章談論了影響中國民眾福利需求的諸多原因，包含了經濟與非經濟因素。然而，「需求」必與「供給」連結，我們看到，西方對於福利需求的研究，往往基於理性選擇理論與中間選民理論的假設，如貧富不均對社會福利產出的影響 (Meltzer and Richard, 1981)，但中國並非民主國家，所謂「中間選民」的概念，在中國並不若西方適用。因此，個體層次的福利需求，並無法如西方資本主義民主一般如此直接的轉譯為福利政策的產出。我們既已理解影響中國福利需求的因素，在下一章我們將對該福利需求與福利政策產出之間的關係進行討論，並討論中國未來福利轉型的路徑與轉型的關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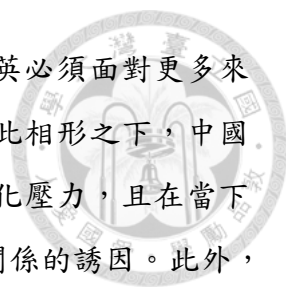
## 第六章 結論：文化遺緒與福利國家

在本論文的最後，我們將基於本研究前幾章的結果，由個體觀點出發，探究中國福利轉型的關鍵與可能性。此外也將在此闡釋本研究進行至此的諸多限制，以及對該領域未來研究發展的展望。但首先，讓我們先由「需求」與「供給」談起。

### 6.1 自個人到國家：福利轉型的關鍵

在個體政策偏好模型中，無論是分配模型、保險模型或是資產模型，其身後都抱持著一重要的理論，即中間選民理論。是故民眾的各種稟賦決定了個人的福利偏好，這些福利偏好匯聚起來，藉由民主選舉機制，而影響執政者的面貌，最終影響實際政策的產出。我們先前花了絕大部分的篇幅討論了影響中國民眾福利需求的因素，以及儒家價值的影響力，然而這些個人因素均無法藉由民主的機制轉化為政策的結果。時至今日，中國民主化的前景依舊渺茫，然而民主與福利轉型之間的關聯性，並非僅僅只是反應了中間選民理論的結果。在民主之前，還必須先有民主化。

最明顯的例子，便在中國所處的東亞。承繼歷史制度論者的觀點，在日本、韓國與台灣，社會政策的施行均是為了經濟發展的大目標，而社會福利的改革與擴展，無非來自於合法性危機與民主化後選舉間的政黨競爭兩者 (Aspalter, 2006)。相較於亞洲另兩個同時高速發展的經濟體香港與新加坡，日本、韓國與台灣的執政者為了在民主選舉中保有執政地位與統治合法性，不得不將威權時代中多侷限於某些特權團體的福利政策，轉向為更為公平的全括式 (inclusive) 福利體系，健康保險與教育體系便是明顯的實例，而不令人意外地，醫療與教育便是中國「三座大山」的其中兩座。相較之下，香港與新加坡則因無來自競爭政黨的壓力，而未出現前述的福利轉型。然而，隨著高漲的民意，我們見到新加坡的人民行動黨在 2011 年大選中輸掉一個集選區並得到獨立後最低得票率後，開始啟動稅制與福利改革，而近期香港所出現的兩傘革命運動，背後除中國/香港之間的矛盾外，也有貧富差距高居不下的壓力。因此，我們難以否認，在東亞文化圈中所發生的福利改革，或多或少都來自民主化或民主競爭的觸發。



民主化並不一定帶來福利的擴張，然而，民主化後政治菁英必須面對更多來自選民的需求壓力，而有相應的政策作為，是不爭的事實。因此相形之下，中國政府政策對三座大山的碌碌無為，也反映了政治菁英在無民主化壓力，且在當下分配體系得到豐厚獲利時，並不會有貿然改變當下政府與市場關係的誘因。此外，縱然在威權體制下，政治菁英為避免民主化危機，仍會對高漲的民意做出有限的讓步，但由於改革開放後三十年來高速的經濟成長以及對流動可能性的樂觀預期，我們看到中國民眾對當下的分配體系有很高的認同 (Whyte, 2010)，且從我們的調查資料中也可看出，多達七成的民眾其實並不認同國家應該擔負民眾生活好壞的責任，因此，在多數民眾仍認同當下經濟分配體系的同時，我們很難預期中國會出現多大幅度的福利改革。而形塑中國貧富差異最大的城鄉之間貧富差距，其差異雖深，但由於「一城之內」與「一鄉之內」的貧富差距仍不算太大，因此，高度的城鄉不均並未導致民眾對於經濟體系的不滿，同時也減緩了政府的轉型壓力。在實際層面上，我們看到 2004 年還有「建立和諧社會」的口號，但曾幾何時，在習近平上位後，反腐以及言論控管的重要性已經遠遠高過先前的「和諧」需求了。

此外，在個人與國家之間還有一個層次值得我們重視，即公民組織。階級—政治聯合結構 (class-political coalition structures) 不僅僅影響了革命的發展，也決定了福利體系的形成路徑，然而在中國，由於共產黨本身的特殊性，除了階級本身不應繼續存在外，在社會團體的層次上，幾乎所有的工會組織均為執政黨所掌握，也幾乎沒有獨立的工會組織，因此我們鮮少見到工會在福利政策上有所表示。而工會之外的公民團體，特別是與公平有關的維權組織，依舊無法為共產黨所忍受，習近平上台後甚至更進一步加強了網路言論的控管 (Cook, 2015)，因此在社會的層次上，我們不僅無法見到公民社會的態度，更遑論有其他政治聯合結構出現的可能性。

未能民主化、多數民眾對當下體制的認同，以及基層需求未能威脅政治菁英的合法性，是使中國民眾的福利需求未轉化至國家福利供給的重要環節，但回到個體層次，由影響中國民眾自身福利需求的因素出發，也使我们認為總體的福利需求並不一定隨著貧富差距而水漲船高。



## 6.2 儒家價值與現代價值

從本文得到的研究結果可以發現，過去被視為阻礙了東亞地區社會福利發展的儒家價值，在個體層次上其實對國家福利的需求有正向的影響。因此在東亞地區，儒家價值雖被作為統治者緊縮福利支出的藉口，但這種價值灌輸反而促使民眾對福利國家有更高的想像，也足以說明為何台灣與韓國在民主化後紛紛進行了福利制度的大幅擴張。但承上所述，在民主未興的中國，該需求要轉化為實際的政策產出，則還需一段時日。

此外，儒家價值的影響力也非固定不變。本文雖發現儒家價值將影響中國民眾的福利需求，但過去研究指出，隨著教育程度的提升，個人儒家價值卻也將隨之下降 (Chang et al., 2005)。然而同時，我們也看到在中國，教育程度的提升也將提高個人的福利需求，因此在高等教育日益普及的大背景下，以教育程度的提升而導致的儒家價值式微對中國民眾社會福利看法的影響，使教育程度提昇導致的福利需求提昇速度較快，還是儒家價值的式微所導致福利需求的下降較迅速，都值得我們再進一步觀察。另外，儒家價值作為傳統文化價值的一環，也受到社會價值現代化的影響。文化有其持續性，但也有變動的空間，隨著經濟的發展與社會的現代化，我們也將見到傳統價值受到衝擊而發生變遷。

傳統價值受現代化影響，而逐漸式微，或受新價值所取代，這便是所謂「文化變遷理論」(the theory of culture shift) 的內涵 (Inglehart, 1997)。由於物質條件的改變，使新世代所關注的事物與過去的世代不同，而形成價值觀的變遷，而從工業社會到去工業化社會的轉變中，民眾對物質重視日益下降，轉而著重自我表現等「後現代價值」。在中國，我們見到見到「文革世代」對於集體生活的懷舊，同時也見到改革開放後的新世代對經濟發展與社會流動性的樂觀態度，這些新價值都是以儒家價值為主的舊中國無法想像的。從中國的例子中我們也可以見到，隨著經濟的高速發展與商品流動的全球化，中國民眾對於金錢的重視已經超越以往，甚至冠居全球 (Ipsos, 2010)。但從文化變遷理論中我們也可以預期，隨著更多民眾的價值觀開始向後物質主義轉移<sup>1</sup>，我們也將在中國民眾身上見到不若以往的新政治文化。

<sup>1</sup>如這些年風行中國的「小清新」概念，即是相當後現代的價值。而環保問題也逐漸成為中國薄弱的公民社會中重要的討論焦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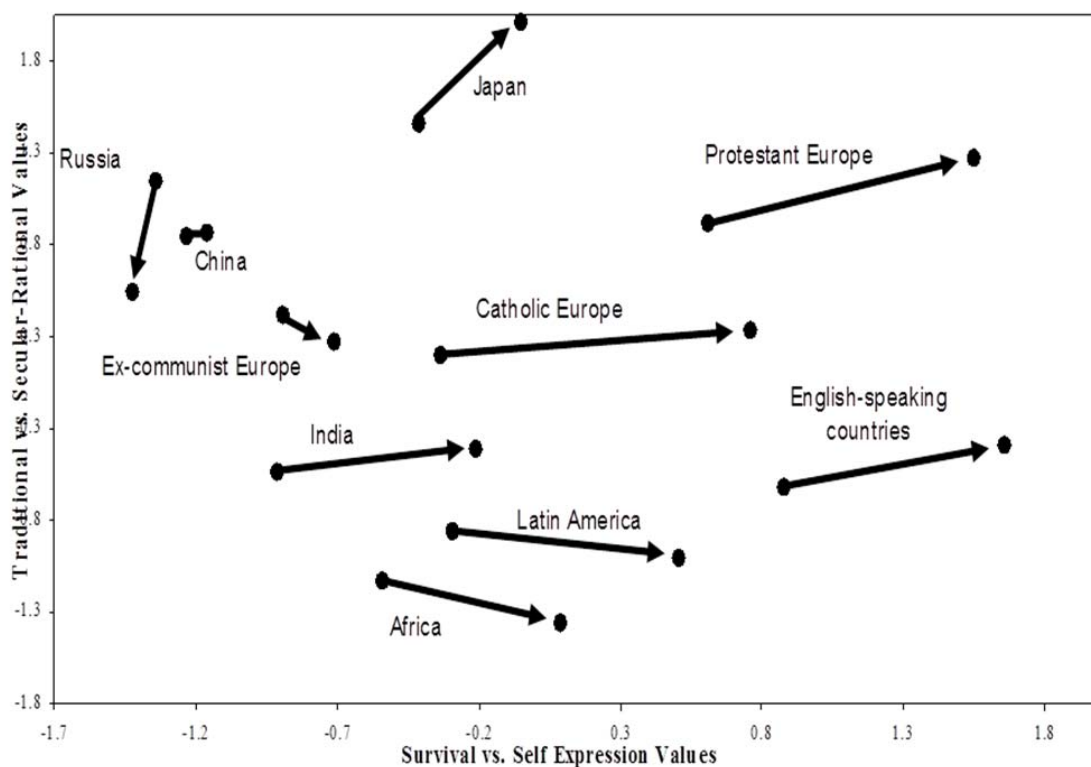


圖 6.1: 各國價值觀變遷：1981-2007（轉載自 Ronald Inglehart 於 2012 年台北演講時所提供之未發表資料）

雖然近十幾年來，中國社會一直有復興儒家價值的呼聲<sup>2</sup>，且中國的價值變遷也不若其他國家一般劇烈<sup>3</sup>，但儒家價值在整個社會的影響力，勢必已經不如過去一般定於一尊，而必須面對許多現代價值的競爭。儒家價值也許會持續影響中國社會對於福利國家的想像，但隨著中國進一步的現代化，我們也必須持續關注其他因素的影響力。

正如我們文中的分析，在形塑中國民眾福利需求的因素中，經濟變項仍有很大的影響，因此，如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後所出現的去工業化，以及因一胎化政策而導致的快速少子化及老年化所帶來的社會壓力，勢必對當下的分配體系產生衝擊。另外，隨著經濟成長率的逐年降低，中國這個可能將「未富先老」的社會中，民眾對當下分配體系的高度認同也將改變，這也是我們值得持續關注中國民眾福利需求的原因之一，而東亞其他國家的轉型，如日本目前所面臨的高齡化與通貨緊縮現象，都值得我們作為借鏡。

<sup>2</sup>如近期的中國夢口號中，也有關懷老者等近似儒家傳統價值的觀念。

<sup>3</sup>來自 Ronald Inglehart 於 2012 年台北演講時所提供之未發表資料，其中，中國是於 1981 年至 2007 年之間價值觀變遷程度最低的國家。見圖 6.1



### 6.3 研究限制與未來展望

本文目的在於補足目前社會政策研究的兩大不足，一是中國民眾個體層次的福利需求分析，二為文化價值對福利需求的影響力的量化研究。然而我們的研究也並非完全盡善盡美。在使用的資料上，由於亞洲民主動態調查資料並非針對民眾福利意向設計，因此在依變數的選擇上，我們僅僅只能以「國家體制偏好」單一問題來捕捉民眾對社會福利的期待。然而由於東亞地區福利體系有其特殊性，如台灣、日本與韓國，均呈現了在教育及醫療層面大量投入，但在「去商品化」層次的政策，如在失業保險或住房補貼等層面，多採取基於個人財力審查 (means-test) 的政策，或以市場機制為主要解決方案。因此，若能更進一步詢問民眾對於特定福利政策的偏好，如對政府預算投入教育或是重分配政策的觀點，將對我們了解民眾福利偏好意向與該體制形成之間的關聯有更多的幫助。此外，社會政策亦有其重分配的層面，而願意犧牲多少個人所得換取分配正義，也是未來我們希望能納入模型的變數之一。

另外，本文最初的出發點在於提出一以文化價值為主影響福利需求的理論，其與西方以理性自利為基礎的福利需求理論不同，認為在經濟匱乏，職業風險與風險規避的傾向之外，個人的價值觀也將對個人對福利國家的看法產生影響。然而，由於 ABS 本身其實並非為了福利研究所設計，且其對職業類別的詢問上，由於採用了 Goldthorpe 的階級分類法，因此我們亦無法將本文的研究與西方近幾年以職業風險為出發點的一般化理論進行對話。而中國民眾特殊的職業型態，如以農民或個體經營者為主的就業型態，是否能與西方以薪資工作者為主的就業型態進行比較，也是值得我們再次深思的要點。而前文所述，有許多在一般化理論中至關重要的變數，如左派意識、社會信任等，由於中國境內的特殊的政治與經濟環境，我們也無法由問卷調查中得到。其中，左派意識亦為影響個人對福利國家想像的重要價值觀變數，但由於中國政治對左右派的敏感性，使我們在短期之內無法藉由調查資料對該變項進行分析。

而中國境內的差異也不僅僅在於城鄉之間，由於廣大的幅員，各省在風土民情以及經濟與社會的發展上也有極大的差異，則勢必也將影響民眾的福利偏好。在未來的研究中，我們也可以將各省市的差異納入分析，並利用多層次

(multilevel) 二元勝算對數模型來保留各省之間的差異，以估計不同地區經濟發展或城市化等因素對福利需求的影響。

多層次分析除了可以用於釐清省市之間的差異外，也可以進行跨國的比較。文化的影響力並非僅僅侷限於一國境內，「儒家文化圈」的概念其來有自，而日本、韓國與台灣，甚至是中國，其實都共享了十分類似的經濟發展方式，以高度的外國直接投資與出口導向型經濟快速脫貧，過去東亞諸國也被歸類於「東亞福利體系」之中，而李光耀的「亞洲價值」言猶在耳，東亞的整體性與之中的歧異性，將有高度的研究價值。此外，目前也還未有學界進行東亞地區民眾的個體資料分析，因此，將我們目前的研究成果推廣到東亞地區層次，並與西方文化進行對照，更將是我們的下一個目標。

另外，我們也將期待的眼光放在第四波的亞洲民主動態調查上。在第四波的調查中，我們發現有更多關於社會正義與福利國家的題組，另外也對職業類別的編碼進行的改善，我們預期，在一次又一次的問卷調查中，我們將有機會將對東方民眾的意向研究與西方研究接軌，並更多地對東西方之間的差異提出解讀。

總結本文研究結果，我們發現並驗證了，由理性選擇理論所導引出的社會政策偏好模型在中國民眾的身上仍舊適用，然而，在經濟因素之外，文化因素也是影響民眾福利需求的重要環節。而千年之前對國家—社會關係提出見解的儒家價值，時至今日仍對中國民眾的福利需求有所影響。然而這並非指明該地區將因這些文化遺緒而表現出福利擴張的政策，本文並未處理由個體偏好到政府政策產出這一段的因果鏈結，不過由既有文獻的討論以及中國—東亞之間的對照，我們認為相反地，民主賦權仍舊是政治文化轉化為政策產出的關鍵。另外，隨著一社會的現代化甚至後現代化，政治文化也將隨之變動，而傳統價值對其影響力的存續與強度，則將是我們必須持續關注的議題。

# 第 A 零章 附錄



## A.1 序位邏輯斯迴歸分析 (ordered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 A.1.1 分析結果

本研究在統計分析的部份，除前章所展現之二元邏輯斯回歸外，得益於亞洲民主動態調查在許多政治態度題組後進行追問，因此我們得以將依變數再依反應強烈重新編碼為五級距變數，並使用與前述相同的自變數進行分析。表 A.1 是依變數的序位分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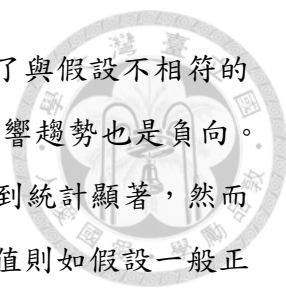
Welfare Demand	Freq.	Percent
Strongly Agree	282	8.12
Agree	725	20.88
Neutral	365	10.51
Disagree	1445	41.61
Strongly Disagree	656	18.89
Total	3473	100

表 A.1: 敘述統計：依變數序位分佈

我們依照與前章相同的方式來建構統計模型，表 A.2 中模型 1 與模型 2 為加入儒家價值之前的模型。我們發現，在序位邏輯斯回歸分析中，原有的經濟變項，如收入與經濟展望等，依舊保持著對福利需求的負向效果。然而，我們在二元回歸中呈現顯著的其他自變項，除教育程度之外，性別與城市/鄉村居民的身份，都失去了統計顯著，僅僅在影響方向上仍舊保持了原有的效果。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模型 3 中，總和儒家價值的影響也未能達到統計顯著，顯示中國民眾在評估要不要更進一步對國家介入民眾生活時，前述的非經濟變數與儒家價值並不是很好的預測變數，顯示儒家價值越強烈，並不會隨之使對福利國家的需求變得更強烈。另外，在影響的趨勢上，儒家價值的影響力也呈現比較負向的趨勢，也與我們的假設不符。


接下來，我們將儒家價值拆解為三個構面加入模型中，其結果顯示於表 A.3。



我們發現，當我們將儒家價值三構面分別加入模型時，亦展現了與假設不相符的現象。首先，家父長價值的影響力並未達到統計顯著，且其影響趨勢也是負向。另外，在 95% 的顯著水準下，社群主義與家庭主義價值分別達到統計顯著，然而社群主義與假設不同，其影響力主要是負向的，而家庭主義價值則如假設一般正向影響福利需求。

接著我們將儒家價值三構面均加入模型中，建構迴歸的總模型，圖 A.1 則為各變數係數轉換為勝算比的圖像化。我們可以看到，在經濟變數與教育的影響力維持不變，而其他自變數均未達到統計顯著的情形下，儒家價值變數中的社群主義與家庭主義價值達到統計顯著。其中，社群主義的效果為負向，家庭主義價值依舊為正向影響。

基於以上的統計分析，我們發現序位邏輯斯分析的結果與我們先前進行二元邏輯斯分析的結果並不相同。首先，在經濟與非經濟變數上，僅有收入、經濟展望與教育程度依舊維持原有的影響效果與統計顯著性，而其他非經濟變數，如前章模型中表現出中國特異性的鄉村/城市居民身分、性別以及反全球化的態度，均失去了統計顯著性，即使顯現了影響的方向，但程度也相當微弱。另外，在儒家價值的層面上，僅有家庭主義維持原有的影響力與顯著性，而社群主義的負向影響則轉為顯著。然而，本文在主文中並未使用序位邏輯斯迴歸的結果進行討論，而仍以二元邏輯斯迴歸為主，我們在下面做出討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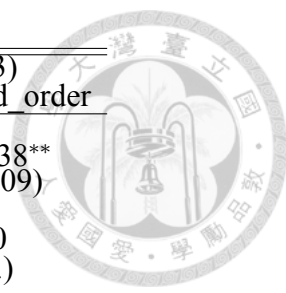


	(1)	(2)	(3)
	demand_order	demand_order	demand_order
demand_order			
income	-0.141*** (-3.39)	-0.145** (-3.26)	-0.145** (-3.27)
edu_c		0.195*** (3.46)	0.192*** (3.40)
age		0.00234 (1.02)	0.00257 (1.12)
0b.female		0 (.)	0 (.)
1.female		-0.0922 (-1.45)	-0.0952 (-1.49)
worsefuture		0.140*** (3.38)	0.136** (3.27)
0b.rural		0 (.)	0 (.)
1.rural		-0.0535 (-0.81)	-0.0482 (-0.73)
anti_glob_c		0.0153 (0.42)	0.0217 (0.59)
confucious			-0.133 (-0.92)
cut1			
_cons	-1.599*** (-25.03)	-1.552*** (-9.70)	-1.620*** (-9.19)
cut2			
_cons	0.297*** (5.24)	0.357* (2.26)	0.290 (1.67)
cut3			
_cons	0.736*** (12.73)	0.801*** (5.08)	0.735*** (4.23)
cut4			
_cons	2.271*** (29.87)	2.342*** (14.15)	2.275*** (12.58)
N	3388	3350	3350

*t* 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

\*  $p < 0.05$ , \*\*  $p < 0.01$ , \*\*\*  $p < 0.001$

表 A.2: 序位邏輯斯回歸模型 1-3



	(1)	(2)	(3)
	demand_order	demand_order	demand_order
demand_order			
income	-0.139** (-3.13)	-0.136** (-3.05)	-0.138** (-3.09)
0b.edu_c	0 (.)	0 (.)	0 (.)
1.edu_c	0.0622 (0.85)	0.0807 (1.10)	0.0734 (1.00)
2.edu_c	0.504*** (4.10)	0.524*** (4.28)	0.537*** (4.38)
age	0.00237 (1.03)	0.00243 (1.06)	0.00170 (0.74)
0b.female	0 (.)	0 (.)	0 (.)
1.female	-0.103 (-1.61)	-0.105 (-1.65)	-0.0978 (-1.53)
worsefuture	0.134** (3.22)	0.129** (3.10)	0.140*** (3.39)
0b.rural	0 (.)	0 (.)	0 (.)
1.rural	-0.0353 (-0.53)	-0.0350 (-0.53)	-0.0478 (-0.72)
anti_glob_c	0.0276 (0.76)	0.0313 (0.86)	0.0118 (0.32)
parental	-0.0558 (-1.28)		
commu		-0.112* (-2.16)	
fami			0.113* (2.13)
cut1 _cons	-1.639*** (-9.96)	-1.735*** (-10.00)	-1.483*** (-8.77)
cut2 _cons	0.275 (1.71)	0.181 (1.06)	0.430** (2.58)
cut3 _cons	0.721*** (4.46)	0.628*** (3.68)	0.876*** (5.24)
cut4 _cons	2.262*** (13.35)	2.169*** (12.22)	2.419*** (13.84)
N	3350	3350	3350

t 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

\*  $p < 0.05$ , \*\*  $p < 0.01$ , \*\*\*  $p < 0.001$

表 A.3: 序位邏輯斯回歸模型 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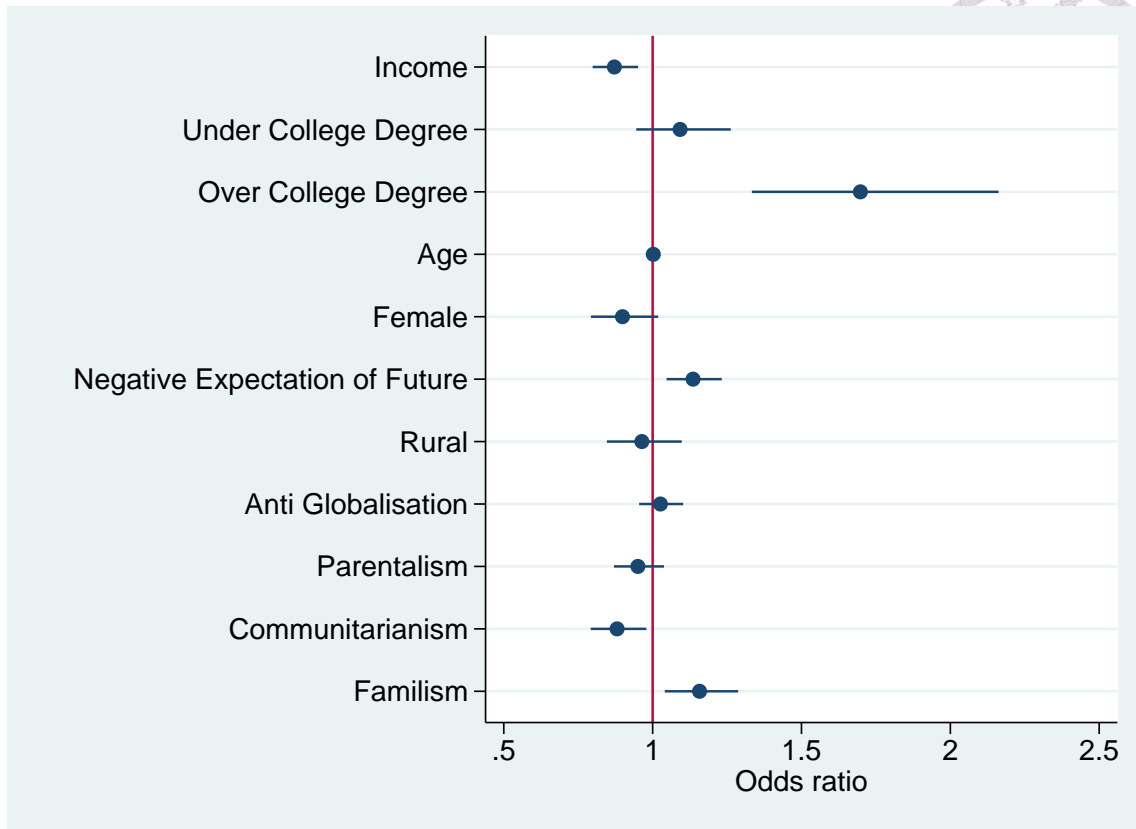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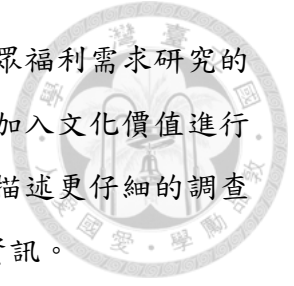
圖 A.1: 序位邏輯斯迴歸各自變數勝算比

### A.1.2 討論

首先，在我們的研究設計上，我們所要捕捉的是民眾對於福利國家「要或不要」的需求變項，因此，在理論上我們便以二元邏輯斯迴歸作為研究分析的主要工具。此外，在我們最初對依變項的敘述統計中也可以發現，中國民眾中「強烈支持」國家介入的比例甚低，僅有 8% 左右，這也會影響我們進行序位統計的信效度。此外，也因分層後降低了每一層次的樣本數，因此將影響變項的顯著性。我們看到許多在二元模型中呈現顯著的社會經濟變項，在序位分析中變得不顯著，細分後的儒家價值也有相同的狀況。

此外，在我們使用的儒家價值總和變項上，由於我們是將各個子價值相加而得到，但從因素分析中也發現，六個子價值並未能很好形成同個因素，另外，三個構面中的每一個子題也並不一定佔有相同的權重，例如在現代社會的脈絡下，家庭價值中的「為家庭犧牲」與「順服長輩」討論的便是對家庭在乎的完全不同面向，因此在進行序位分析時，也將影響呈現的結果。

不過序位邏輯斯分析的結果，仍舊可以作為我們對中國民眾福利需求研究的一個探索。畢竟過去對中國民眾福利需求的研究本就甚少，而加入文化價值進行討論的，則更是從未有過，因此，當未來我們有對重分配強度描述更仔細的調查資料時，我們的研究結果也得以作為對照，並提供文化層次的資訊。



## A.2 變項說明

變項名稱	問題	測量	處理方式
依變項 福利需求	請問您心目中理想的政府應該是什麼樣的。如下兩段話中，您更同意哪一種說法？	1. 每個人生活的好壞，應該由他們自己承擔主要責任。 2. 人民生活的好壞，政府應該承擔主要責任。	非回答 2 = 0 回答 2 = 1

表 A.4: 題目內容與變項建構 - 依變項

變項名稱	問題	測量	處理方式
經濟變項 收入級距感知	請問您全家的總收入是否可以支付您家的開銷？	1. 略有結餘 2. 收支平衡 3. 入不敷出	回答 1 = 0 回答 2 = 1 回答 3 = 2
負面經濟展望	您家的經濟情況五年後會有什麼發展？	1. 好很多 2. 好一些 3. 跟以前一樣 4. 差一些 5. 差很多	維持原順序編碼

表 A.5: 題目內容與變項建構 - 經濟自利變項

變項名稱	問題	測量	處理方式
經濟變項 收入級距感知	請問您全家的總收入是否可以支付您家的開銷？	1. 略有結餘 2. 收支平衡 3. 入不敷出	回答 1 = 0 回答 2 = 1 回答 3 = 2
負面經濟展望	您家的經濟情況五年後會有什麼發展？	1. 好很多 2. 好一些 3. 跟以前一樣 4. 差一些 5. 差很多	維持原順序編碼

表 A.6: 題目內容與變項建構 - 經濟自利變項

變項名稱	問題	測量	處理方式
<b>儒家價值</b>			
家父長主義： 仁慈的家長	為下兩變數結果的加總 如下兩段話中，您更同 意哪一種說法？	1. 政府是人民的公僕， 應該由人民告訴政府要 做什麼； 2. 政府就像父母一樣， 應該替我們做決定。	回答 1 = 0 回答 2 = 1
無條件服從	政府的領導人就像大家 庭的家長，他們關於國 家事務的決定，人民都 應該服從。	1. 非常同意 2. 同意 3. 不同意 4. 非常不同意	回答 1 與 2 = 1 其他 = 0
社群主義： 為群體犧牲	為下兩變數結果的加總 為了集體的利益，個人 的利益都可以犧牲。	1. 非常同意 2. 同意 3. 不同意 4. 非常不同意	回答 1 與 2 = 1 其他 = 0
求取和諧	為了集體的和諧，我們 應該避免和其他成員發 生公開衝突。	1. 非常同意 2. 同意 3. 不同意 4. 非常不同意	回答 1 與 2 = 1 其他 = 0
家庭主義： 為家庭犧牲	為下兩變數結果的加總 為了家庭的利益，應該 把個人的利益擺在其次 。	1. 非常同意 2. 同意 3. 不同意 4. 非常不同意	回答 1 與 2 = 1 其他 = 0
順服長輩	即使父母的要求不合理 ，子女仍應該照著去做 。	1. 非常同意 2. 同意 3. 不同意 4. 非常不同意	回答 1 與 2 = 1 其他 = 0

表 A.7: 題目內容與變項建構 - 儒家價值變項

變項名稱	問題	測量	處理方式
基本變項 性別	受訪者性別	1. 男性 2. 女性	男性 = 0 女性 = 1
教育程度	您的教育程度？	0. 不識字或小學沒畢業 1. 小學畢業 2. 中學輟學 3. 中學畢業 4. 高中輟學 6. 夜大、職大、電大、 函大畢業或通過承認 自學考試 7. 全日制大專、大學畢業 8. 研究生畢業或以上	未識字與國小 = 0 小學到中學 = 1 中學畢業以上 = 2
城鄉身分	依受訪者居住地編碼 的變項	1. 居委會 2. 村委會	居委會 = 0 村委會 = 1

表 A.8: 題目內容與變項建構 - 基本變項



### A.3 迴歸模型的變項訊息

變項名稱	平均數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有效個數
<b>依變項</b>					
福利需求	0.292	0.455	0	1	3473
<b>自變項</b>					
經濟自利變項					
收入級距認知	1.081	0.752	0	2	3388
負向經濟預期	-0.878	0.784	-2	2	3473
<b>基本變項</b>					
性別（女）	0.474	0.499	0	1	3473
教育程度	0.696	0.647	0	2	3455
城鄉身分（鄉村）	0.537	0.498	0	1	3473
<b>儒家價值變項</b>					
家父長主義價值	1.054	0.745	0	2	3473
社群主義價值	1.576	0.614	0	2	3473
家庭主義價值	1.244	0.603	0	2	3473
<b>其他價值變項</b>					
反全球化價值	0.824	0.882	0	2	3473

表 A.9: 迴歸模型的變項訊息

## 參考文獻



- Alesina, A. and Angeletos, G.-M. (2005). Fairness and redistribution.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5(4):960–980.
- Alesina, A. and Giuliano, P. (2011). *Preferences for Redistribution*, pages 93–132. North Holland.
- Andersen, C. J. and Potusson, J. (2007). Workers, worries and welfare states: Social protection and job insecurity in 15 oecd countries.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46(2):211–235.
- Aspalter, C. (2006). The East Asian welfare mode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Welfare*, 15(4):290–301.
- Bambra, C. (2007). Defamilisation and welfare state regimes: a cluster analysi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Welfare*, 16(4):326–338.
- Chang, Y. T., Chu, Y. H., and Tsai, F. (2005). Confucianism and democratic values in three chinese societies. *Issues & Studies*, 41(4):1–33.
- Chau, R. C. and Yu, W. K. (2005). *Is welfare unAsian?* The Polity Press.
- Cook, S. (2015). Five predictions for chinese censorship in the year of the sheep.
- Economist (2012). Rethinking the welfare state - asia's next revolution. *The Economist*.
- Emmenegger, P. (2009). Specificity versus replaceabilit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kills and preferences for job security regulations. *Socio-Economic Review*, 7(3):407–430.
- Esping-Andersen, G. (1990). *The 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Fincher, L. H. (2014). China's growing gender gap: women are not just 'leftover' but left out.

Goldthorpe, J. H. (2000). *On Sociology, Numbers, Narratives, and the Integration of Research and The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USA.

Goodman, R., Kwon, H.-j., and White, G. (1998). *The East Asian Welfare Model: Welfare Orientalism and the State*, chapter 1, pages 3–24. Routledge.

Hall, P. A. and Soskice, D. (2001).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USA.

Holliday, I. (2000). Productivist Welfare Capitalism: Social Policy in East Asia - Holliday - 2002 - Political Studies - Wiley Online Library. *Political studies*.

Holliday, I. (2005). East Asian social policy in the wake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farewell to productivism? *Policy & Politics*, 33(1):145–162.

Huang, Y. (2010). Debating china's economic growth: The beijing consensus or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Academy of Management Perspectives*, 24(2):31–47.

Ingelhart, R. (1997). *Modernization and Postmodernization: Cultur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43 Societi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Inglehart, R. and Norris, P. (2000). The developmental theory of the gender gap: Women's and men's voting behavior in global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1(4):441–4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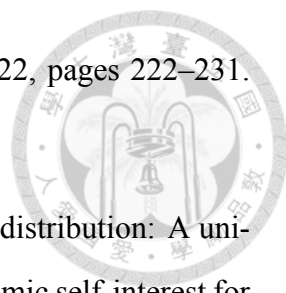
Ipsos (2010).


Iversen, T. and Cusack, T. R. (2000). The Causes of Welfare State Expansion: Deindustrialization or Globalization? *World Politics*, 52(3):313–349.

Iversen, T. and Soskice, D. (2001). An Asset Theory of Social Policy Preference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5(4):875–893.

Jones, C. (1990). Hong kong, singapore, south korea and taiwan: Oikonomic welfare states.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25(4):446–462.

Kwon, H. (2007). Transforming the developmental welfare states in East Asia.

- 
- Li, B. (2013). *Welfare state changes in China since 1949*, chapter 22, pages 222–231. Routledge International Handbooks. Routledge.
- Mehlkop, G. and Neumann, R. (2012). Explaining preferences for redistribution: A unified framework to account for institutional approaches and economic self-interest for the case of monetary transfers for families and children.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51(3):350–381.
- Meltzer, A. H. and Richard, S. F. (1981). A rational theory of the size of government.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9(5):914–927.
- Midgley, J. (1986). Industrialization and Welfare: The Case of the Four Little Tigers. *Social Policy & Administration*, 20(3):225–238.
- Moene, K. O. and Wallerstein, M. (2001). Inequality, social insurance, and redistribution.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5(4):859–874.
- Nickelsburg, J. and Timmons, J. F. (2012). On the (ir)relevance of skill specificity for social insurance. *Quarterly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7(1):35–67.
- Nickerson, M. M. (2012). *Mothers of Conservatism: Women and the Postwar Righ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Piketty, T. (1995). Social mobility and redistributive politic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0(3):551–584.
- Rawls, J. (1971). *A Theory of Justic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 Rehm, P. (2009). Risks and redistribution: An individual-level analysi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42(7):855–881.
- Rehm, P., Hacker, J. S., and Schlesinger, M. (2012). Insecure alliances: Risk, inequality, and support for the welfare stat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6(2):386–406.

- 
- Rieger, E. and Leibfried, S. (1998). Welfare State Limits to Globalization. *Politics & Society*.
- Rivoli, P. (2005). *The Travels of a T-Shirt in the Global Economy: An Economist Examines the Markets, Power, and Politics of World*. Wiley.
- Scheve, K. and Slaughter, M. J. (2004). Economic Insecurity and the Globalization of Produc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8(4):662–674.
- Scheve, K. and Stasavage, D. (2006). Religion and preferences for social insurance. *Quarterly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3):255–286.
- Shin, D. C. (2011). *Confucianism and Democratization in East Asi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icular, T., Olinto, P., Ashwill, M., Ferreira, F., Lopez-Calva, L.-F., Newman, J., Demombynes, G., Reva, A., and Mulligan, M. A. (2013). The challenge of high inequality in china. *Inequality in focus*, 2(2).
- Tang, K. L. (2000). *Social Welfare Development in East Asia*. Palgrave Macmillian.
- Taylor-Gooby, P. (1985). *Public Opinion, Ideology, and State Welfare*. Routledge Kegan & Paul.
- Thelen, K. (2012).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Trajectories of liberalization and the new politics of social solidarity.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15:137–159.
- Thompson, M., Verweij, M., and Ellis, R. J. (2008). *Why and How Culture Matter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USA.
- UNU-WIDER (2014). World income inequality database (wiid3.0b).
- Walker, A. and Wong, C.-k. (2005). *East Asian welfare regimes in transition East Asian Welfare Regimes in Transition: From Confucianism to Globalisation*. Polity Press.
- Walter, S. (2010). Globalization and the welfare state: Testing the microfoundations of the compensation hypothesi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Whyte, M. (2010). *Myth of the Social Volcano: Perceptions of Inequality and Distributive Injustice in Contemporary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Xie, Y., Zhang, X., LI, J., and Yu, X., editors (2013). *Wellbeing Development Report of China*, pages 344–367(in Chinese). Peking Univ Press.

Xie, Y. and Zhou, X. (2014). Income inequality in today's china.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1(19):6928–6933.

